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7.4

一年出版4期，以17种语言刊出

访谈

Kari Polanyi Levitt

川普主义的本质

捍卫阿根廷社会学

Peter Evans,
Raka Ray,
Cristina Mora,
Ruth Milkman,
Dylan Riley,
Cihan Tügal,
Gay Seidman

Juan Piovani,
Fernanda Beigel,
Alejandro Grimson,
Agustín Salvia,
Berenice Rubio,
Gabriel Kessler

特辑

> 纪念Ali Shariati

> 《全球对话》中文编辑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4期 / 2017.1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全球对话》的历史

《全球对话》是从2010年的8页通讯开始的，起初只有4种语言：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而且是由简单的微软软件所制作成的，并且只有4个人就完成了。7年过去了，《全球对话》已经成为了一年出版4期的杂志，每期有40页，并且以17种语言出版。每期的出版甚至包括来自全球超过100人的共同合作，至今已经出版31期了，包括了约550篇文章，作者来自69个国家。从一开始我们就试着要让所有人都可以取得杂志，不但是为了翻译方便，也为了传播方便。毕竟，社会学对于这个各种灾难层出不穷的世界，有着相当重要的讯息要传达。

虽然新的科技可起让灾害更加恶化，科技也提供了我们新的机会。数字媒体让《全球对话》得以可能，但是别忘了，人类的劳动还是最基本的。虽然ISA补助些许的金额，但是这还是由年轻社会学家透过年长的学者的指导去完成的，特别是那些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这样充满热忱的合作是最令人兴奋的其中一件事。

早些时候，版面设计者August Bagà (Arbu)提议要让《全球对话》有个令人兴奋的外观，于是他和对于ISA三种官方语言都流利的Lola Busuttil一起成为管理编辑。Lola监督整个运作，确保每一种语言的版本都按照高的标准，这带来了美丽的《全球对话》的诞生，并且透过网站管理者Gustavo Taniguti而出版到网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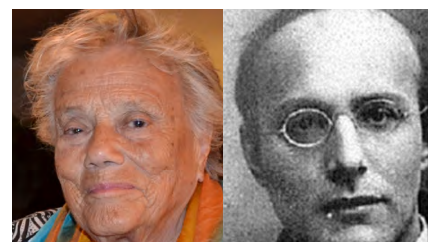
当我是ISA的副会长的时候，我有了机会去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那些交流的机会支持了这本杂志的内容。当把文章编辑成可读的形式的时候，我发现或许太多了，于是我问Gay Seidman来帮我，在她成为杰出社会学家的时候，她是记者和编辑，她于是慷慨允诺了，要把“社会学学术语言”转译成简单但是优美的英文。她把注意力带到作者上面，并且有效地执行，提供绝佳的咨询。在Gay处理之前，Berkeley的一组研究生会把非英文的稿件翻译成英文。

还有许多人需要感谢，首先是Robert Rojek在最早主动提供了SAGE的资金无条件支持。从一开始ISA的Izabela Barlinska就是《全球对话》的大力支持者。这过去7年来我也得到了ISA执行委员会的背书，否则这不会如此成功。我卸任会长一职之后，Margaret Abraham和Vineeta Sinha也很热情地继续支持。我们现在有了很棒的新主编：Brigitte Aulenbacher和Klaus Dörre，他们将会把《全球对话》带到另一个高峰。若有任何想法或建议请不要等，立刻写信给他们！

从《全球对话》可以看到全球历史的涨潮与退潮，我们从2010年讨论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开始，然后乐观的社会运动，像是占领，阿拉伯之春，Indignados, piqueteros，以及其他劳工、环境、女性主义、社会正义的运动。但是从2013年开始，我们开始看见了反动和反民主的乌云，我们把Karl Polanyi看成先知，重新学习Polanyi很久之前教导我们的，就是那些反动运动去释放出的市场力量是同样可能带来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同样可能带来民主和威权。我们对于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有许多要学习。因此，我想我以访谈Kari Polanyi Levitt作为开始讨论其父亲的思想是很恰当的。

过去7年来我试着把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带进来，但是我尚未深入讨论美国。在我作为主编的这最后一期，我向我7位朋友和同事邀稿，从他们有兴趣的角度去探讨川普主义。他们把美国放在历史和全球的脉络如何摆到光谱右边，而这个反动年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把社会学放到了防御的一端，防御新自由主义和威权的入侵。阿根廷的社会科学家由Juan Piovani所带领已经进行了全国的社会学防守，从事专业、政策、批判、公共社会学的研究，所以有5篇文章代表了他们的观点，该计划才是开始而已，而其他社会学家可以就此关注学习。

最后，我们也不该忘记了我们的先行者—那些奋力对抗威权的社会学家，像是马克思和伊斯兰的思想家Ali Shariati，其于1977年过世，也就是伊朗革命的两年前。他继续影响着该革命，包括革命原本可以如何，以及可能如何的问题。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先知，因为他们可以启发一种在决定论和乌托邦之间的社会学。而《全球对话》是一个我们可以集体辨识和想象新的可能的地方，以避免我们这个小地球的最终毁灭。■



Kari Polanyi Levitt和Michael Burawoy的对话，谈论她著名的父亲Karl Polanyi。



Peter Evans, Raka Ray, Cristina Mora, Ruth Milkman, Dylan Riley, Cihan Tuğal, Gay Seidman讨论川普主义的源头和意义。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赞助。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org)。
投稿請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mailto:Brigitte.Aulenbacher@isa-web.org) 和 [Klaus Dörre](mailto:Klaus.Dörre@isa-web.org)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副主编	Gay Seidman.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k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ina Bastani, Mina Azizi, Hamid Gheissari, Vahid Lenjan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taka Eguchi, Kota Nakano, Aya Sato, Kaori Sayek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Jan Frydrych,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Maria-Loredana Arsene, Timea Barabasz,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Dan Gîțman, Alina Hoară, Alecsandra Irimie Ana, Alexandra Isbășoiu, Rodica Liseanu, Cristiana Lotrea, Mădălina Manea, Anda-Olivia Marin,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ș-Mihai Muș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Codruț Pînzaru, Ion Daniel Popa, Anda Rodideal, Adriana Sohodoleanu.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iforova, Anastasia Daur.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编辑顾问: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全球对话》的历史	2
巨变的形成：访谈Kari Polanyi Levitt Michael Burawoy, 美國	5
> 川普主义的社会根源	
在川普经济民族主义的背后 Peter Evans, 美國	11
川普主义和白人工人阶级 Raka Ray, 美國	14
移民和川普时代的政治 G. Cristina Mora, 美國	16
川普对劳动的侵害 Ruth Milkman, 美國	18
美国的雾月？ Dylan Riley, 美國	21
列宁右派的兴起 Cihan Tuğal, 美國	24
在巴西和南非的民主失序 Gay W. Seidman, 美國	27
> 捍卫阿根廷社会学	
仔细检视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阿根廷	30
勾勒阿根廷社会科学的轮廓 Fernanda Beigel, 阿根廷	32
阿根廷的社会和文化多元性 Alejandro Grimson, 阿根廷	35
当代阿根廷的社会不平等 Agustín Salvia和Berenice Rubio, 阿根廷	38
研究阿根廷的社会资本 Gabriel Kessler, 阿根廷	41
> 特輯	
Ali Shariati：被遗忘的伊斯兰社会学家 Suheel Rasool Mir, 印度	43
《全球对话》中文编辑 何經懋，臺灣	45



> 巨变的形成

访谈Kari Polanyi Levitt



| Kari Polanyi Levitt.

MB：让我们从最一开始开始讲起。我们习惯把Karl Polanyi看成是匈牙利人，可是他事实上是在Vienna出生的，对吗？

KPL：是，有趣的是，我爸和我都是在Vienna出生的，我妈妈则是在距离Vienna不远的一个小镇出生。Vienna毫无疑问是一个知识的重镇，是奥匈帝国的核心。

我的祖父和祖母是从Vienna开始的，我祖母Cecilia Wohl被她的父亲从俄国Vilna送回来去学贸易。因为教育，她说俄语和德语。我祖母后来遇到我祖父Mihaly Pol-

Karl Polanyi 是社会学中的经典思想家。其著作《巨变》已经是社会学各个领域必读经典。影响力也远超出社会学之外，到了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其批判在过去 40 年被奉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认为它毁坏了社会的肌理。该书同时也讨论了商品化的起源和后果，以及对商品化进行对抗的社会运动，包括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社会民主，显然对于我们当前的全球处境息息相关。Karl Polanyi 于 1886 年出生，1964 年过世。本篇访谈是访谈其女儿 Kari Polanyi Levitt。她描述了其父亲的一生，以及《巨变》一书的诞生故事。她也指出了其父亲和母亲 Ilona Duczynska 的特别关系，还有她自起成为政治运动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包括匈牙利阶段，奥地利阶段，英国阶段，以及后来的美国阶段。Levitt 博士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居住在加拿大 Montreal，写了很多本书，包括了《从巨变到金融化》(From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 the Great Financialization) (2013)，已经编辑了《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1990) 一书。这篇访谈是 Michael Burawoy 在一场 Karl Polanyi 会议结尾与 Levitt 博士的对话缩短版，是由 Brigitte Aulenchbacher 和她的同事于 2017 年 1 月 10-13 日在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举办 (Linz, 澳洲)。。。

lacsek, 他是一个匈牙利的犹太工程师, 会说匈牙利语和德语。所以整个家庭都是会说德语的, 而不久之前, 我才从通信中得知我爸一直到Budapest的中学以前都还没学过匈牙利语。

我爸的匈牙利期间很重要, 也被俄国影响形塑, 这是透过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来, 那时和社会民主是很不一样的。俄国社会主义更靠近农村和农民, 有着无政府主义的元素, 公社则是当然很重要的一环。

我必须说这样的俄国影响在他父亲那边被平衡掉了, 因为其相当喜爱英国的传统。如果有两个人影响了我爸最深远的话, 我会说一个是莎士比亚, 因为我爸把他的书带上战场。另一个我会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MB: 然后也有俄国革命者的影响, 其中一个**是Samuel Klatchko。**

KPL: 是的, Samuel Klatchko是个特别的人, 住在Vienna。他是个非官方的使者, 连结了俄国革命家和国际与欧洲的其他革命者。其从Vilna的一个犹太家庭而来, 并在Kansas俄国公社渡过的年轻时光。该公社并不持续很久, 后来瓦解了, 把3000牲畜赶到Chicago, 然后造访了New York的国际女性成衣工会。他是个运动者, 而Kansas公社的名字则是以一位俄国人Nikolai Tchaikovsky命名。

但是当Klatchko到Vienna的时候, 他和Pollacsek家族建立了有好的关系, 并且招待那些从俄国来买马克思书籍或是做其他事情的人。

而我爸告诉我一件事情我永远没忘记, 那就是这些人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 也注意到表弟Irvin Szabo。他对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很有善, 那些人有些没有鞋子, 是用报纸把脚包起来的。我爸爸对于这些人的英雄主义和勇气印象很深, 并且有种浪漫的想象, 不过虽然浪漫, 但是更是一种尊敬, 特别是巴古宁, 因为我想他是最伟大的人了。

MB: 而这样对于革命者的同情持续了一生, 也解释了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模糊态度?

KPL: 是的, 这持续了一生。这也解释了其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人士的敌对态度, 而其后来则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多数组成。

MB: 您父亲在学生的时候就热衷政治了, 对吗?

KPL: 是的, 他是一个学生运动的创始社长, 叫做伽利略派(Galileo Circle), 出版刊物Szabad Gondolat, 意思是“自由思想”。其反对君主专制, 寡头统治, 教会, 也反对奥匈帝国。那不是个社会主义运动, 但是许多成员是社会主义者。而最后也招纳了来自高中和大学的年轻人, 其每年开设了2000班的识字课程。其主要活动是教育。

MB: 然后一次大战发生了。

KPL: 他在战场上是骑兵军官, 为俄国作战。处境是很可怕的, 对奥匈帝国和俄国两边都很可怕。他得了斑疹伤寒, 很可怕。他告诉我说, 他最后他的马跌了, 压在他身上, 他想他铁定死了, 不过醒来后是在医院里面。

MB: 然后战争后有了匈牙利革命。

KPL: 1918的匈牙利革命结束了战争, 带来了Count Karolyi的第一共和, 其也是该年秋天第一任总统。所以大家通常称紫苑或是菊花革命, 或是其他秋天的花名。后来就是短命的议会的革命, 在1919年的8月就结束了, 被匈牙利知识分子、运动者、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自由派的反革命所破坏了。

MB: 所以你父亲在革命结束前就离开了, 是吗?

KPL: 是, 结束前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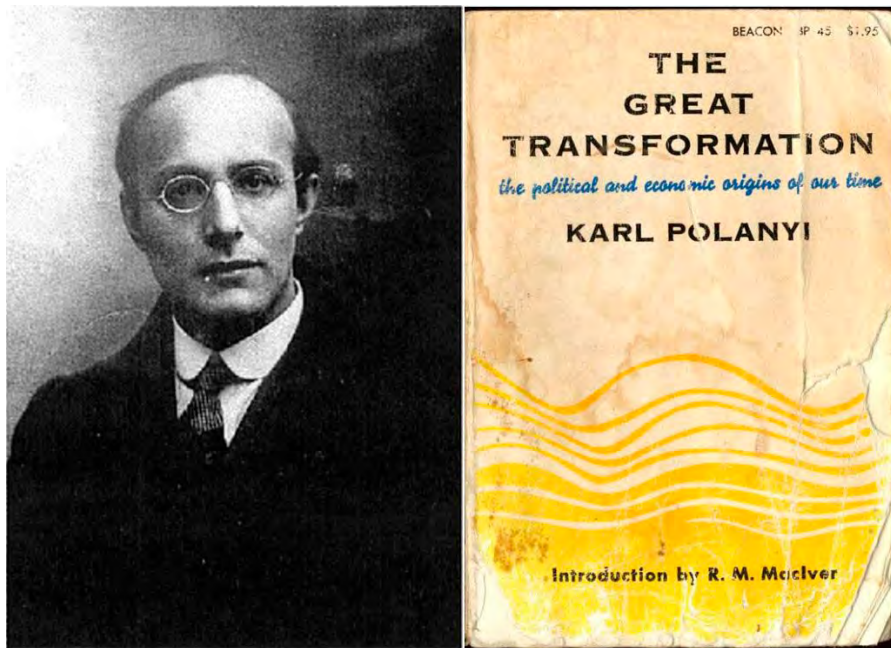
MB: 他怎么看匈牙利革命。

KPL: 他态度是暧昧的, 这和许多其他人很像。我想他一开始是欢迎整个国家都建立议会, 但是当议会决定要把商业和一切事物国有化后, 他想这一定无法善终。而事实上也是。

MB: 所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从Budapest逃到Vienna?

KPL: 是的, 流亡的共产党有两个领导Bela Kun和George Lukács。两人之间有敌对, 而且有趣的是我妈在1919年于Moscow的时候是有牵扯上的, 因为我妈的语言能力和教育程度, 他和Karl Radek于同一间办公室, 组织第二次共产国际。当她回到Vienna后有人转交资源给她要给共产党人, 以钻石

>>



的形式，并且装在牙膏里面。她后来把她交给Lukács，因为作为银行员的儿子他或许比较值得信赖。

MB：但是这个时候妳母亲和父亲还未在Vienna相遇，而是在下一年，也就是1920才认识，对吗？

KPL：那是命运的安排，那在一个村庄，由匈牙利共产党和左派组成的会议，加上一个Vienna的祝福者。在一个众多年轻男性的场合，没人料到我妈会被一个年长10岁的男士所吸引，我母亲的人生远远落后这个沮丧在角落自己写笔记的人。

MB：但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性格，一个比较运动者，一个比较知识分子。一个在外面征战，一个埋首研究。

KPL：是也不是。我爸其实相当活在当下，他为公众写文章，只要有人看，他就会写他要说的。只要有人出版，他都可以。在匈牙利如此，在Vienna如此，在英国也是如此。

所以他非常活在当下的份为中。他是知识分子，没错，但是他不是自我陶醉的知识分子——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恋，不论到哪里都讲同样的东西，但我爸不是这种，一点也不是。

我妈则是从匈牙利革命开始就有着非常显著的资历。她接下来的人生没有事情可以超过这个了，但这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你知道，一旦你年少得志，接下来的人生都很难超越之前的成就了。

MB：所以他们都悲伤的经验，不过1923有件事情很特别，那就是妳出生了！妳的父母相当高兴，彷彿回春一般。

KPL：是的，按照他的说法，我的出生让我爸得以走出忧郁，这是私人的事情。然而，他却写了很多关于这件事情。他写他对于他的世代的责任，以及那些糟糕的事件，特别是那些无意义且愚蠢的战争。他写了一次大战，写其如何没啥改变，但是那是什么却也从来没被他说清楚。那就是个糟糕的屠杀，人类的灾难，而我父亲认为他们的世代有责任。

而那种责任，也就是社会责任，之于世界，之于国家，我也想知道这是否是那个世代的集体特征，以及那种责任意识是否过去了。我们现在仍然看到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持有这种对于世界的社会责任感吗？

MB：这是很特别的世代，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之一是红色Vienna，这是1918到1933年社会主义对Vienna的重建，这些年也和您父亲重迭。

KPL：是的，红色Vienna是历史上一个惊奇的一段时光。那是一场地方社会主义的实验。那时工人是有特权的，而且是一种社会特权，享有服务，享有集体住宅。卡尔马克思大院当然是个杰出的案例。

但是不仅仅如此。那是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像是我爸没有任何身份地位，没有教职，但却可以教授社会主义等的公共课程。他在金融的期刊挑战Ludwig van Mises的市场导向思想，Mises会响应，我

>>

爸也会。那里有学院之外的知识生活。

MB: 你对这段期间记得了多少？

KPL: 我只是个小孩，记不了太多，但是我记得我参加的很棒的夏令营，那是在Salzburg的最好的湖边，是由社会主义运动所组织的。人们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红色Vienna，那是现代都市的最好一个范例。虽然我的父母亲都没有对社会民主很有好感，但是两人都承认他们在红色Vienna的时光是特别且值得回忆的。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我听到我妈赞美社会民主党人。我爸也差不多。

MB: 1922年你父亲写了一篇著名了文章论社会主义计算，是支持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公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是被Vienna的地方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所影响。

KPL: 这边要注意，那时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对吧？俄国才刚从内战中走出来，所以有知识分子在辩论如何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Mises开了第一枪，他是写文章说那是不可能的人，因为他没有价格市场的话，没有一个理性的方式可以分配资源。我很确定学经济的一定很熟悉这个说法，而Polanyi则挑战了这个论述，用了一个组织合作的社会主义模型去反对，部份是以Otto Bauer和G. D. H. Cole为基础。

MB: 当你父亲在Vienna的时候，其对于俄国1917革命的看法为何？

KPL: 首先，第一次俄国革命是1917年，也就是二月革命，该革命结束了战争。他的看法是那是很好的，因为就像所的匈牙利人，他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战争没人喜欢啊，所以战争结束了，革命被欢迎了，我想是这样的。

MB: 十月革命呢？

KPL: 对我父亲来说二月和十月革命都是布尔乔亚阶级的革命。他们是法国革命以来的后续的最后一波，席卷欧洲，然后最后到了俄国，他是这么说的。

MB: 所以真正革命发生在集体化和五年计划之后？

KPL: 是，我想他会说社会主义诞生在五年计划之后，大概在1928或1929年。在那之

前，俄国是个农民社会，是个农业国度。我们现在有篇他的文章写作于1940年的Bennington，最近才发现的。那里他说明了俄国的内在困局，简单说，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基础，他们控制城市并且依赖农民，农民控制乡下的食物供给。但是也又一个外部困局，对于俄国农民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出口谷物，那是因为国际市场在大萧条之后已经瓦解了，可是谷物是那时俄国的重要出口。

MB: 所以这已经相互矛盾了，是吗？我们当然会听到他替社会主义革命和参与民主背书，但是他似乎是支持斯大林主义的？

KPL: 是的，但是像是其他人指出的，那是有脉络的。而且他思想有趣的地方，也许是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的论点不是从一个单一原则导出的，而是从处境和可能性而来的。

第一个极端是：现实，自由——什么是当时俄国现实处境和可能？你有个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也有农民不想被国有化，想要自己的土地。他们确有土地，也有权力，掌控的食物供给。

然后里有个国际的处境。后来有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只有在英国我爸真正成为了苏联的支持者，脉络则是在德国扩张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冲突而导致。

MB: 所以你父亲在1933年离开Vienna。

KPL: 是，他因为法西斯而离开了Vienna。那是由一个知名经济期刊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编辑委员所下的决定。我父亲是编辑中的领导人物，而委员会认为我爸英文很好应该去英国。我父亲有联络人，于是1933年出发前往。他持续发表到之前的期刊，只是该期刊于1938年停止出版了。

我们全家没有一起过去，我父于1933，我则是1934被送到英国。我和非常好的英国朋友Donald和Irene Grant住在一起，他们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为学生基督运动工作，并救助那些战后的贫穷奥地利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识我朋友。我妈后来1936年，也就是两年后。

MB: 让我们回到你父亲在英国的时候，他那时做些什么？

KPL: 当我1933年到达的时候，他没有正式工作。他的支持来自Betty和John MacMur-

>>



ray 以及Grant家庭，他们都属于基督左派，或是基督社会主义者。那里也有共产主义者和宗教人士，多数是新教徒。

他写了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文章，被认为是对基督价值的轻蔑，这是在他共同编辑的书《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中写的。我父亲带领了一个英国基督教朋友的读书小组，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巴黎手稿》，出版于1932年。他在带领的时候亲自为他们翻译成英文。他对于这些工作很雀跃。我知道他与他们之间共识的意义，所以我会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马克思和Polanyi 的共同起点。

MB: 他在书中也说了这么多，而英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KPL: 直到1937年以前，我父亲受雇于工人教育组织(WEA)，那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老的教育运动，英国是把它连结到Ruskin College，这里让工人阶级的学生若是无法上大学就可以受到教育。

我爸有机会到Kent和Sussex教书，他在那边和一些家庭过夜，更了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并且很惊讶他们的文化贫脊，Vienna虽然比英国还穷，但是文化素养比英国高。透过这样的比，我父亲甚至认为奥地利是一个在货币上来说比英国更穷的人。

他被要求教授的课程是英国社会经济史，但是他其实一无所知这个领域，若你看到《巨变》一书的后面，你会看到他研究的范围之大，这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其奠定在李家图、马尔萨斯等其他关于工业革命的作品之上。

所以我妈写在《The Livelihood of Man》一书前言中的说的，也就是我父亲是

在英国开始研究市场社会的源头，让人类远离人性。

然后当然他也研究的英国的阶级体系，阶级包括了说话的差异，并认为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很像，也和美国的种族主义很像。

MB: 1940年Karl Polanyi被邀请到美国的Bennington College去演讲。

KPL: 是，在Bennington他获得了2年的奖助，这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去赞助撰写《巨变》一书的。他得到了Bennington的主席的很大支持，但是要跟基金会报告。但不论他写什么，基金会都不喜欢看。他们很怀疑我父亲可以在大学任教。

他写说他对于“匈牙利法律，大学教书，哲学”更加感兴趣。说喜欢哲学真的是不合基金会，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奖助被更新了，两年后，这时是1943，我爸非常想回英国，不想留在美国。他想参与英国的战后规划，但这时候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情势，很清楚的是盟军会胜利，他最后留下两章没写完，你看书就会发现是那两章，不是最后一章，而是最后一章之前的两章。

若他有写完，按照他的书的架构，那我想“一般人的伟大计划”将会是他想要写进那两章的，但是他留给了同事，而对于那两章也有很多的争议。

MB: 但是他后来到了Columbia 大学任教，只是你母亲被禁止进入美国，所以在加拿大定居了。

KPL: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留在英国，那里我爸可以继续为WEA工作，但是很明显的是，他真的有话要告诉世人，有书要写，有工作要做。而在英国那不会在任何学校有分工作。这是很清楚的，所以1947年Colum-

>>

“市场机制成为人类的主要引导力量和环境，将会走向社会的毁灭。”

Karl Polanyi

bia提供了工作，就是以《巨变》这本书为基础，该书由该校的Robert MacIver所写序，其经济学的制度论相当有名，这和我父亲的取径是符合的。然后，我母亲于London被告知其不被获准进入美国，这是的头痛的问题。我爸非常之失望，想要我母亲去说服美方让她入境，但她不愿意。但那也不可能。所以我爸后来就想说或许可以搬到加拿大，于是最后说服了我妈。于是他们在Toronto郊区有了一间很漂亮的小房子，那时是1950年，他像学生一样通勤，于圣诞节和彩蛋节以及暑假期间回来。

MB：他的研究也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变成对人类学更有兴趣。但是我想这可以是另外一次对话的主题了。谢谢妳对我们描述Karl Polanyi 的一生！妳让我们知道《巨变》一书的诞生历史和脉络，我想我们更了解这是个20世纪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交织的产物，也因此至今仍如此重要。■

> 在川普 经济民族主义 的背后

Peter Ev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ISA经济与社会研究员会(RC02)委员, 未来研究委员会(RC07), 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RC44), 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RC47), 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56)成员。



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修辞

“经济民族主义”有其受尊敬的历史。从Alexander Hamilton到Friedrich List,再到其于拉美、非洲、亚洲的20世纪的继承者,经济民族主义被称为是贫穷国家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工具,用来“赶上”富裕的国家。而川普的“美国优先”修辞和英国的经济全球化被脱

>>

欧拒绝之后，代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吗？若仔细检视，会看到这是天大的误解。

川普版本的经济民族主义接合了无效的霸凌和华丽的词藻。“美国优先”是川普最爱的飘标语，而虽然他的经济民族主义修辞是奠基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失败而受到欢迎的，但是却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一点威胁也没有。其对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的批评或许让人一时很高兴，可是对于贸易协议的既有内容是一点改变也没有的。要求美国企业不要把工作带出美国的说法可谓是个很好的一场秀，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要求会对全球生产链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为什么史蒂夫班农一很不幸地是川普幕僚中最接近所谓的“大图像”策略者的人——会说经济民族主义是该川普政府三个支柱的其中之一呢？班农就像川普一样，知道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可以被挪用来说起那些累积已久的不满、埋怨，激起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诉求，并且可以用来削弱政党精英的正当性。

从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未给多数美国人带来好处。停滞的工资成长结合了收入所得的集中在少数的 0.001% 的人中 ([Piketty, Saez, Zucman](#))，而在千禧年之交，经济痛苦被转换到了低教育程度白人的药物成瘾的流行扩散，和前所未有的低预期寿命。

传统的美国政党精英发现自己被困在盒子里面，他们不愿意去冒风险承受大众动员挑战政党，但也无法抵挡大众日益上升的愤怒，两党精英已经无法说服美国一般民众以自由贸易为主的全球化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川普侵略性的修辞和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拥抱让他和传统的政治精英切割开来。他把结构导致的资本主义负面结果化约成美国 and 外国谈判技巧的衰弱，仿佛这种弱点可以简单地被攻击性的谈判策略所翻转，所以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巧妙把川普的经济政策转移焦点：让首都可以享受更多的剩余价值，去管制化，保护那些掠夺性的经济行为。

这种政治技巧让经济民族主义成为其政纲的第二根支柱。川普仍然是当代美国总统中最不受欢迎的人，但是经济民族主义是他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没有了它，他只剩下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两个意识形态武器了。

英国脱欧提供了互补的观点去看“全球利伯维尔场带给了所有人繁荣”这个信念如何破产？戴维卡麦龙或许预设了一般的英国人会和他一样对于 London 的银行家们有着不减的热情，其获利是位于其位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特殊位置为基础的，但是这也让英国人直接投票否定了，这种公投是从柯林顿到欧巴马也都不敢做的事情，所以英国政治精英仍然处于惊吓状态

之中。

川普和英国脱欧并没有对全球资本榨取获利的能力带来任何威胁，但是他们或许意味着（或是肯定了）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层政治基础的反转。在全球北方，政治精英不再认为列宁的名言“民主共和是资本主义最好的政治庇护所”是理所当然的了。对精英来说，让一般人民去对全球资本主义投票是有风险的，而选民也不信任精英，质疑全球化带给他们的益处。精英和大众都对于自由民主体制有疑问，像是 Wolfgang Streeck 所说的，“资本注意和民主的婚姻已经破裂了。”

在全球南方，这个议题甚至更为重要。南方的政治人物了解其必须要和全球资本开启的政治空间译进行操作。习近平很小心地不要让人觉得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这在 Davos 论坛上可以看见。即使巴西的惊奇胜利，中国、印度在 WTO 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很竞争的。他们不去主张民族主义目标的正当性，反而去策略性地和北方站在一起，遵从伪善的自由贸易规则。然而，这已经不是 David Harvey 所描述的十年前的世界了。市场的影响力或许吸引了邓小平，但是习近平不是市场的真正信仰者。智力的皮诺切死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忠诚要像南非的慕贝基那样是很难找到了。

即使全球南方的领袖对于新自由主义不信任，但是也难逃全球资本主义的威，并且也没有办法像川普这样打经济民族主义的牌。没了这张牌，若新自由主义失败，那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就是政客所能打的牌了。

Cihan Tuğal 描述的尔多安在[土耳其的演变](#)就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例子。从一个“中东最世俗且最民主的国家”开始，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首先拥抱了资本新自由主义。他发现新自由主义无法提供传统民主政治一个政治上的霸权的时候，转向了 Tuğal 所说的“硬独裁”并且以“大众动员”和“政治狂热”为基础。

印度莫迪政府也是同样主题的不同版本。最极端的宗教偏执在这个有了 70 年历史的民主国家（虽然不完美）出现了，而千禧年时印度对于资本新自由主义的拥抱把多数的穷人抛在后头，而莫迪的印度人民党也转移焦点，透过印度教沙文主义策略，恐吓穆斯林，也恐吓其他“外来者”和“不忠诚”的印度教人。

不论焦点是否是川普，全球资本主义都没有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所威胁。真正对于一般大众的威胁是反动政治的兴起，他们没有政治信念和能力去挑战全球资本新自由主义。

川普是个全球威胁，这不是因为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全球最危险的军事机器的总指挥。看他目前为止的政策，与其说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发现了经

济民族主义可以用来转移选民焦点的工具的一个政客。其他必须忍受资本主义失败但是又被全球资本权力所排除在外无法打经济民族主义排的领导人是可可能使用更有害的政策去去保住权力的。

没有所谓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迫使我们去接收资本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迫使我们去接受那些政客用来保有权力所想出了可怕政策。除非我们由下而上进步动员，政治精英会一直认为经济限制让转型无法展开，但是政治上的非预期结果可能会开启无法预测的可能，也可能导致失望的倒退。

虽然川普透过经济民族主义想要努力掩盖其回到反动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让他的支持度增加，但是美国政治人物中最受欢迎的是桑德斯，他做了一见美国政治中前所未有的事情：以社会主义为号召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之一。■

來信寄給 Peter Evans <pevans@berkeley.edu>

> 川普主义和白人工人阶级

Raka Ra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川普的核心支持者：白人工人阶级

在媒体上或是学术界中，常常会看到把那些投给川普或是参加在维吉尼亚州 Charlottesville 的右翼抗议事件是“愤怒白男人”。像是华盛顿邮报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白男人这么生气？”社会学家 Michael Kimmel 认为“愤怒的权利意识” (aggrieved entitlement) 聚集了这些人。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后，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数据，就是 71% 的未上大学的白人男性投给了川普，而过半数的持有大学学历的白男人 (53%) 也投给了川普。

虽然左派或右派都用了“愤怒男性白人”来描述这群选民，我认为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检视每一个环节。这群投票者同时是男性、白人、也是工人阶级。种族、阶级、性别必须被分析，理解，放在一起讨论。

在美国，福特主义的衰落以及“好”

工作的消失并不是阶级的讨论议题。在 20 世纪中，美国的福特主义提供了好的工作，像是制造业的生产线，标准化的产品，高工资让工人可以买得起其生产的产品，以及受保障的雇佣。但是福特主义在现实中有更多的意思。福特主义以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国内消费主义为基础，从来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已。它同时也反应的父权制度，也就是福特主义的意识形态预设的家庭的工资基础，认为一分受入就可以支持整个家庭。而家庭收入这样的制度导致了男主外（生产）、女主内（消费）的分工，男人而非女人必须得到好的工作，这样性别化的预设让女人要待在家中，加上不平等性别工资，再生产了这样的性别分工。的确，在男性心底最深处对于自己身为男人的理解是有着根深蒂固认为自己必须负担全家家计的想法的。

被排斥在家庭工资收入制度之外的是那些收入不高无法撑起一家人那些人：黑人和移民。福特主义因此让白人技术蓝领阶级工人享有特权，这也排除了那些未婚或没有另一半的女性，以及那些另一半的工资总是无法支持全家家计的女性。同时政府在这个时候也投资在健保和教育，因此养老和好的生活这样的期待是让白人工人阶级觉得可得的图像。

福特主义的衰落也和女性社会运动以及种族平权运动的兴起同时发生。这些运动诉求工资平等，生育权利，言论自由，反战，性解放。此外，福特主义衰退和家庭工资下降带来了双薪家庭的产生，挑战的传统的家庭工资的制度。而现在全球化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时代，制造业被移到低工资的国家，许多工作也因为生产自动化而消失了，新的趋势把女性纳入了劳动力市场，国家进入、企业退出社会福利。

过去 40 年，白男人的中位数收入在控制通货膨胀之后一直没有起色，而白人女性收入成长了几乎两倍。黑人女性的中位数收入也成长了超过两倍，而黑人男性的收入也稍有起色。即使在大衰退期间，白男人，黑男人，黑女人也都有成长，但是白男人的收入成长只集中在富人阶级。

因为福特主义也是关于阶级、种族、性别，对于其衰落的响应也奠基在这三个面向：当白人工人阶级丢掉工作，他们失去了男性尊严，失去了对女性的控制权力，失去了以往对于有色人种的优势，他们失去了过去的自己，虽然“愤怒的权利意识”听起来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不妥当。

哲学家 Nancy Fraser 对于两种美国政治抗争的分类：重分配抗争和认同抗争，我认为提供了有用的观点去思考这个问题。她定义重分配抗争是在争取物质平等，包括收入，财产持有，工作，教育，健保。重分配指向了社会经济的不公平。而认同的抗争则是指向了象征

层次的不公平，像是对于边缘团体的文化宰制，不被肯认，不尊重，像是同志、跨性别、黑人、女性等。那是对于尊重重要包容的争取。

虽然 Fraser 在分析的层次上把认同抗争和重分配抗争区分开来，但是现实上人们的生活中，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大学学历的白男人在 2016 年同时投给了重分配和认同：他们想要被肯认为男人，因为他们不在是撑起家计的一家之主，因此害怕失去男人的社会地位。许多人甚至认为其身为白人的身份被取笑，被认为顽固，且女性越来越有权力，而国家明显透过积极平权法案偏好有色人种。

美国右翼比左翼更了解这种心态，并且有办法透过文化论述去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像是：

- 应得和不应得的贫穷：有些人不想工作，但是有些人是因为被解雇。
- 本土主义：移民不但强走了饭碗，甚至把原本很白的美国玷污了。
- 男人应该是负担家计的人：也暗示了想要领导的女人应该认清自己的本分。

这些成功的认同和重分配的论述开启了一个愤怒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场域。

除了少数的例外，美国左翼的讨论中，重分配和认同是脱勾的。经济正义的政治、文化正义的政治、环境正义的政治通常是彼此敌对的。像是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的确结合了重分配和认同的政治，不过尚未受到广泛回响。虽然要左派们团结总是比较困难的一这有许多因素，是论述的也是物质的一但是这样一来，右翼抬头，并且取得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

來信寄給 Raka Ray <rakaray@berkeley.edu>

> 移民

和川普时代的政治

G. Cristina Mo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川普正在翻转美国立史的原则：美国是个移民大陆

2016年11月大家讨论的是谁会让美国伟大，谁又会带来道德和经济的衰退。而这辩论的中心是移民的议题，大家会听到“坏蛋”和“罪犯”等词去说墨西哥或是其他国家来的移民，这样把移民和罪犯划上等号的修辞，连同其他像是工作消失等的讨论，可谓激励了一种民族主义、反移民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在川普于共和党大会上达到高潮，川普站在美墨边界的背景上，支持者高喊“盖围墙”。

对许多研究移民的学者而言，川普这样的议题炒作可说是个危险的错误，理由有三。首先，移民在过去10年是个零合的局面，意思是说每年的移入和移出人口是一样的，而最新的数据显示有更多的墨西哥人移出美国，而非移入。而尽管政治上对于突然涌入的“非法”移民入侵美国这样的讨论不曾休止，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许多的研究包括了政府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移民提供了经济成长的净值，所有移民，即使是尚未获准的移民，都缴税，而且移民二代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多的企业工作人口。还有，移民比起本地出生的人口要更少地注册公共补助福利，这是一个被很多政治人物和部落格警告“社会福利女王”所忽略的事实。最后，移民会想要融入，更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文化威胁，大多数的移民，特别是小孩们，都学英语。而

且多数移民都有宗教信仰。事实上，所谓的“坏蛋”墨西哥移民多数是信仰基督宗教的，这个事实让里根总统宣称拉丁裔移民是共和党人，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但是尽管这样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对于移民会带来危险的政治操作仍然占据每天的头条。这是因为右翼的政治策略成功而导致吗？不太全然。中间派媒体的主流民主党人也有份。譬如，纽学时报虽然不像其他右派媒体那么直接，但是也常常报导移民的成本和犯罪，以及对社会的益处。而尽管欧巴马政府通过了DACA（儿童移民暂缓遣返法案）¹，其遣返移民的政策和布什时代是一样的，而且遣返的移民数超过了其前两任总统总和的两倍，这个纪录让他成为“遣返统帅”。虽然欧巴马着重在遣返新的移民，而非已经生根落脚的移民，但是这个作法并没有让那些移民权利运动者所期待的一套完善的移民法规改革所满意，这似乎背离了他当初竞选的“是的，我们可以”的承诺。

然而，民主党会支持移民权利的这种想法还是一直持续到2016年11月。提姆肯恩作为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演说的时候准备了西班牙文的讲词，承诺会修改移民反归，而希拉里柯林顿则在德州和佛州的竞选活动时承诺会作到欧巴马时代该做而没有作到的移民政策。拉丁裔的游说团体非常看中这些竞选承诺，动员人们去投票，保住了西南部的州也让第一为拉丁裔女性进入了参议院。

亚裔的游说团体也不遑多让。虽然人数少了很多，亚裔团体组成了移民权利运动的很大一部分。选前一个月，亚裔团体宣称亚裔投票者会让那些可能翻盘的州像是维吉尼亚和内华达决定是红是蓝。他们也发动了投票注册的活动，警告民主党人要把移民改革作为政纲的核心部份。

但是尽管这些努力，拉丁裔和亚裔并无法左右选举结果。选举的命运决定在密西根，宾州，俄亥俄州的小镇，不是那些沿岸的移民居住地。的确，中西部的锈带区域经历了自从1990年代以来的移民人口的双倍成长，移民不

只在农业中有工作，也在工厂中有头路。这些“外来人”的长相和文化可能让他们成为了右翼政治人物的目标用来动员其选民的。对政客来说，把工作失去和经济衰退的责任全推给移民是再容易不过的一见事情了，要去谈全球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的机制，还是算了吧。

所以移民权利的前景呢？答案是不明朗，除了我们知道州会变成移民运动的立即目标。加之提供了健保和驾照给无证移民，确保某种政治上的融合，城市宣布为“保障移民”的城市，这就是一个对于川普政府的抵抗。

前方的路仍然险阻。川普控制了奥巴马所调整过后的精致移民遣返系统，而他的第一年继续把移民和犯罪连结起来。其穆斯林的旅游禁令重新点燃了把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的议题。其特赦了 Joe Arpaio——一个亚利桑那州的警察违反了法院命令去居留移民，理由单单是因为那些移民是未获核准的，这再一次说明了川普的“坏蛋”逻辑。以外，川普还试图去终结 DACA，这说明了在川普眼中即使是那些小孩、尚未犯罪也不可能对社会带来危险的移民也是“坏蛋”。

而抗议是答案吗？2006 年有上万名的移民权利运动者上街高喊“今天我们游行，明天我们投票”和“移民权是人权”，十多年过去了，两者没有一个实现。没有赦免的话，移民不会变成公民，而运动者诉求的“移民人权”或是希望美国人会把移民看成是全球市民的一分子，这样子的论点在川普的民族主义时代显然不适合。而且运动者担心未来的抗议会带来反扑：地方的反移民犯罪行为在 2006 年的抗议之后急剧升高。

移民改革是两党利用的马前卒而已。要去让家人重新团聚或是让移民有机会可以实现美国梦是很值得的，而移民权利运动者也昼夜不懈地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没有父母亲应该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分离，而且没有人应该因为在边界的另一编出生就被拒绝在保证安全、居住、机会之外，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要对美国移民法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系统就是去执行其目的，当初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我们的全球市场可以剥削的劳动力。没有暂时的缓解，政策的小改变，或是短期的赦免可以改变这个巨大的动态结构。



川普威胁要取消奥巴马时代的行政命令DACA（儿童移民暂缓遣返法案），这法案主要是针对无证的儿童移民，或称“梦想者”。

注 1: DACA（儿童移民暂缓遣返法案），这法案主要欧巴马的行政命令，是针对无证的儿童移民，或称“梦想者”给予 2 年的可更新宽限期，并且可以有工作准许权。■

来信寄给 G. Cristina Mora
<cmora@berkeley.edu>

> 川普对劳动的侵害

Ruth Milkma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國, ISA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委員(RC44)



川普竞选的时候成拉拢了工会成员，工会领导干部开在川普后面一字排开。图为川普和工会领导干部。

美国劳动运动的讣闻早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前就写好了。几十年来，工会率和罢工持续减少。这个趋势当初在里根当选之后快速增加，里根对于锈带白人工人阶级的民粹诉求早在川普当选的36年前就出现了。里根比川普赢得了工会家庭的选票还多了一些（45% vs 43%），不过大众早已忘记了。

当然，劳工运动的瓦解已经大量减少了工会家庭投票者的分母，而2016年为止只有10.7%的美国劳工参加工会，其中6.4%来自私部门，这是从1950年代的35%高峰降了很多的。罢工率也从1980年代开始急遽下滑，而发生的罢工事件通常是企业试着要打压工会

>>

迫使其接受更差的条件所导致。“工作权利”法（禁止私人企业必须雇用工会劳工）在2016年底扩展到27州，这是从1975年的20年成长而来，包括了前工会率很高的州像是密西根和威斯康新。这年2月，第28个州（密苏里）也加入了，而就像每个人都知道的，去工会化和不平等的恶化是在过去40年一起进行着的。

当代组织劳工的可行场域是在公部门，而且工会率相当高，也相对稳定。但是在衰退之后，这个现象也开始改变了，在共和党执政的州有一股立法的趋势要限制公部门劳工的集体议价权利。最好的范例就是威司康辛，在1959年是第一个州立法公部门的集体议价权利。2011年其共和党的州长Scott Walker推动了一个反转这个的法案，尽管大规模的抗议产生，这个法案还是通过了，Walker很骄傲地签署该法案。

而结果是很糟糕的，威州的公部门工会比例从2011年的50.3%降到2016年的22.7%。如同Gordon Lafer在他的书《The One Percent Solution》中说的，威州只是一个右翼系统性要去削弱美国公部门工会率的第一个战场而已，不用说工会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政治资金主要来源。全国来说，公部门的工会率只有下降一些，从2008年的36.8%到2016年的34.4%。但是若更多的共和党跟进威司康辛，这会有所变化。

在里根的执政第一年终，白人工人阶级被他暴力性地背叛了，他自己还是一位贸易工会主义者。里根很出名的是他在一次1981年的罢工之后开除了上千名空中交通管制人员，那是一个对于美国劳工动衰退的一个历史事件。该工会是支持里根的。里根对于罢工的无情响应还是战后的首见。瓦解其工会是里根时期的著名劳动事件，甚至短暂取消了联邦对于工会人员的资料收集（这后来被恢复了，是由于企业的抗议）。

川普的竞选不时提到“被忘记的男人”，召唤一个工人男子气概的图像，特别是他所在的房地产业的建筑工人。同时，他也在其办公室里数落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而不是那些在工地的工人。川普对于白人工人阶级的同情修辞以及反对由柯林顿代表的精英，代表那些“可怜的人”，复制了里根对于“里根民主党人”的诉求，甚至“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都是学里根的。

但是若川普的修辞有很大的回响，其真正

的劳工政策是比里根的反工会要更不明显的。而大众被他的推特吸引了目光，或是其他像是白宫内部斗争的议题，其实实际上右翼已经悄悄地开始前进了，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川普政府开始消那些减少工作的管制政策，最有可能的是去取消一直搁置着的增加的工资门坎（1975年来没动过），然后以超时工资的自动合格去取代之。此外，健保很少被看成劳动议题，不过川普要拿掉的欧巴马健保的举动是对白人工人阶级有害的。

川普对于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的五个提名人就非常的反工会，这和里根时代是一样的。两个川普的提名人已经通过了，第三个将会在现职委员退休后到任，届时川普势力将会完全掌控该委员会，而在2018年，欧巴马时代的对于工会友善的政策将会被反转，川普原本提名的劳工部长是快餐企业的老板Andrew Puzder，后来被迫放切，但是那是因为他的家暴历史以及雇用无证移民，并不是因为其反对劳工管制。

而对于美国工会最有影响的一个川普提名是大法官Neil Gorsuch，而所有的人都认为Gorsuch会在Janus v. AFSCME一案中有决定性的影响。该案是被伊利诺的一小群公部门员工所提出，受到了全国工作权利基金会和保守的自由正义中心所支持，威胁去取消由非会员的公部门集体议价合约所支付“公平分担”或是“代理”费用，许多州的法律要求公部门工会去代表所又在其议价单位内的工人，不仅仅是那些会员而已。而公平分担费用意思是去负担那些代理和避免白吃白喝的情形发生。一些州（包括威斯康辛和爱河华）已经禁止这个费用了。Janus将会延伸这个禁令到全国，这会对于公部门工会来说是很不好得消息，不论在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的州都是如此。

然而，这样的下重手会影响到全部的组织劳动的说法并不过时。现在，川普和工会的关系遵循着传统“分而治之”的策略，并且这是一个种族和性别明显分割的一条线。其就职的第一天就邀请的建筑工会人士到白宫；然后他也会见了警察工会员工。这些劳动领袖代表了白人男性，其他还包括了川普讨好边境管控巡逻员工会。他宣布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还有其他的自由贸易，这些都是在工会中获得回响的，特别试制造业，虽然有人认为他宣称有办法把工作留在美国是“假新闻”。

然而如此友善的序曲是很明显的缺乏的，

>>

特别是当我们讨论到服务业和公部门工会、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时候，更是如此。有时候也包括移工，而这群人是川普的排外主义所针对的。川普的努力的把美国本土劳工一是多数人且都没有加入工会一转向敌视移工就是一个明显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川普其实偏离了里根主义，因为里根主导了最后一次的主要移民改革(1986 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并且特赦了上百万的无证移民。不过，川普除了这点不一样之外，其工会的对策是和里根令人胆寒的相似的。像是我们说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发生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

來信寄給 Ruth Milkman <rmmilkman@gmail.com>

> 美国的雾月？

Dylan Ri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总统(1848-52)，马克思笔下当资产阶级失去领导权后的具魅力领袖，就像川普。



川普的胜选会带来美国政治的彻底位移吗？会，但是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川普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一种“新波旁主义”，

用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置换了霸权的计划。就像是法国 19 世纪，川普的波旁主义被连结到霸权的危机，这是由于让那些美国资产阶级可以获利的物

>>

质基础开始缩水导致，同时宣称要代表社会。这个危机有破碎和脆弱的政党系统，伴随前现代的国家制度和大众政治冷感。任何适当的对于川普的政治响应必须处理让他胜利得以可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问题。

> 霸权和危机

从 1930 年代到 1970 年代，美国资本阶级维持了一个福特主义的霸权，这是以高工资，健保，完全就业为基础的。而长期的战后成长让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可以取信于工人阶级。可是从 1973 年开始的美国经济缓慢下来让这改变了。对于企业精英来说，快速生产的成长和获利让福利国家的扩张得以被接受，可是来自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竞争让获利率减少，游戏规则改变了。政府和国家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转守为攻，并且快速调整。美国福利国家在卡特政府下重新起来，持续到欧巴马时代。因的霸权公式是新自由主义，并且也保证了自由和自决，并透过市场和工人被重新想象为消费者得以可能。工资成长和社会福利前提之下，减税被认为是共识的物质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可追溯到 2008 年 10 月 3 日，当时 7000 亿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TARP) 帮助纾困的银行，揭露了市场经济意识型态的伪善。新自由主义在欧巴马时代持续，并且在环境和 LGBTQ 议题上让步。不过欧巴马政府不能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欧巴马取得了金融资本和富有阶级的支持远胜过于布什，特别是欧巴马健保法案让保险业者得利许多。欧巴马时代私人部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重组了，资本家越来越仰赖国家。

川普有办法有效地去把新

自由主义的瓦解政治化。虽然他的经济政策已经被许多专业意见所评论过了一纽约时报专栏也是诺贝尔得主 Paul Krugman 谴责川普的就职演说试图去召唤“社会和经济瓦解的反乌托邦，和美国现实社会不太有关系”，但是川普指出的问题却是很真实的，1980 年时，制造届仍然提供 22% 的就业，并在密西西比以东、以北、以南上升到 30%，在南加州和太平洋西北，航空业增加许多。2015 年，制造业剩下 10%，影响了不仅仅是锈带的中西部，还有南部和西部州。去工业化有着负面的社会后果，像是贫穷、用药等等。

当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被掏空而中位数薪资停滞的时候，经理人的报酬却高得不得了。美国资本阶级的利益因此是从整个社会中所撷取而来的，川普的选举因此是统治阶级的危机。美国社会精英不再有机会可以生产让大众信服的论述。

> 2016：外卡选举？

在一个意义上，2016 年的选举是一个历史外卡案例。但是有三个结构因素使其可能：政党体制的掏空让川普和桑德斯可以崛起，美国国家的前现代特征，然后政治冷感。第一个很明显，不用多说。而另外两个也同样重要。

美国国家的前现代制度特殊性在川普胜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系统是设计去保护那些蓄奴者的寡头统治。美国选举系统和德意志帝国以及乔利蒂的意大利国会很像：有限选举权，多数决，选举取得代价很高，国家的选举人制度。川普赢得大选，却输掉了总票数接近 300 万票。的确，美国政治体系的法国旧政权变形随着都市化而更加明显。

政治冷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有 55% 的合格投票者投

票，并且集中在有钱和受过教育的人手中。民主党的投票者似乎比共和党更不喜欢投票，按照一个调查，有 46% 的共和党人投票，但是民主党人只有 42%，有色人种更是占了无投票者的大多数。若是有更多的民主党人出来投票，那就会阻止川普当选。

> 共识消解

川普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川普无法通过什么法案，这似乎说明了高关税和对于移民的控制可以扩大本地人就业和制造业，但是认为管制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限制这种说法是奇特的。

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要开始了吗？虽然无法开启一种正常的美国外交政策（因为退出巴黎协议，拒斥人权和民主的原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本将会一样重要，而布什和欧巴马发动的战争会继续下去。

> 未来

政治抗争的新图像将会为何？国际关系中，川普计划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建设刺激经济，加上谈判技巧，去施政。但是其计划很不一致。美国赤字那么多，要怎么对抗中国？我们应该期待在宰制阶级之间的强硬抗争才是。

川普之所以不是法西斯是因为他缺少了党的组织，军队，意识形态。其外交政策是“孤立主义”而非扩张主义。Berlusconi 或许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比，但是这里有两个主要差异，首先，这位意大利巨贾比起川普要更属于精英阵营，其有大的媒体帝国，并且可以直通政治精英阶级，这是川普没有的。更重要的，Berlusconi 的学习榜样是里根，以美国的方式去诉求意大利的需要，总之，Berlusconi 是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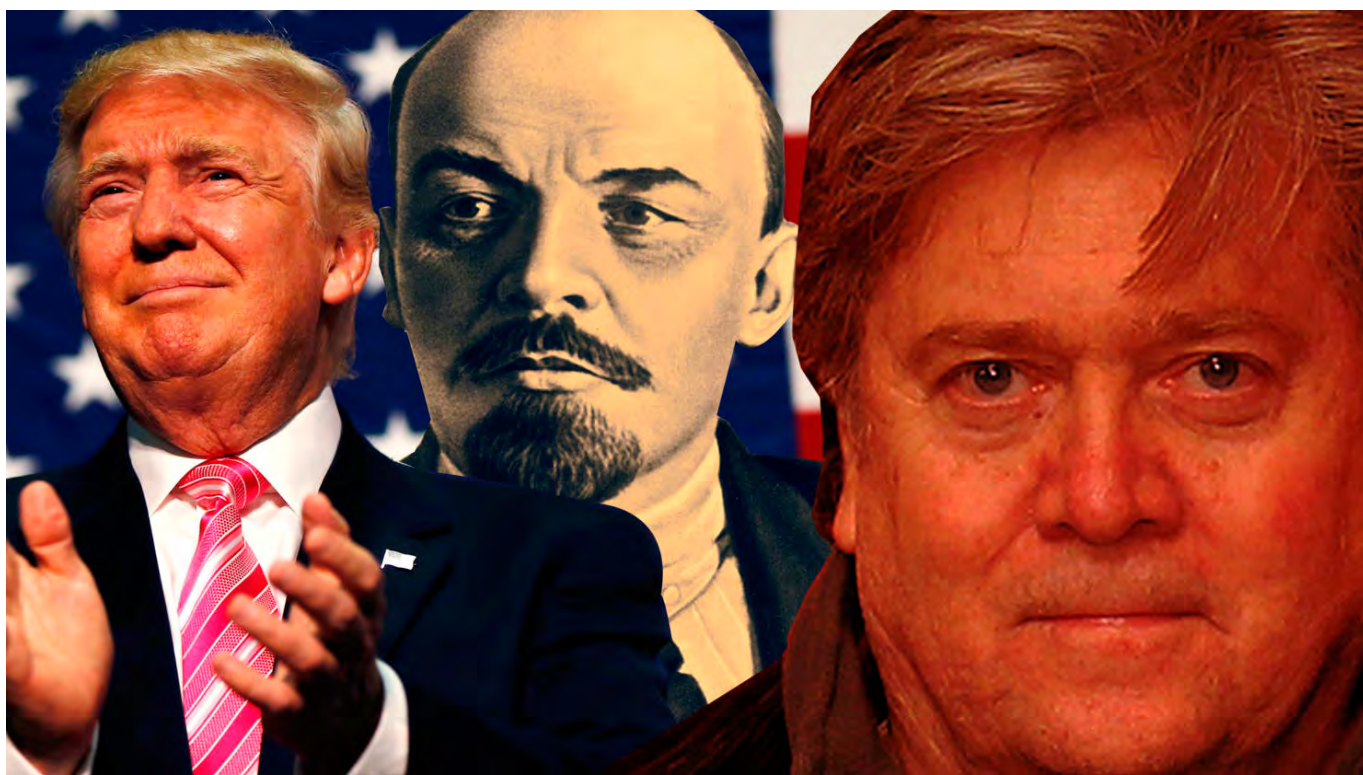
晚期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川普很显然正在破坏之。普丁或是欧班或许是更有用的对比。从此观点而言，川普可以被看成“新家长制”的人物，其聚集了一群追随者并且用国家的规模去奖励这些人。

“川普凯恩斯主义”经济虽然令人怀疑，但是可以导引政府资源到中西部去巩固其选票的。但是透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去发展美国经济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期待这种漂浮和衰退的持续。另一方面，川普胜选所体现的精英分裂或许会开启美国的进步向左大转弯的机会。■

來信寄給 Dylan Riley
<riley@berkeley.edu>

> 列宁右派的兴起

Cihan Tuğ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Steve Bannon是另类右派的知识分子，跟列宁一样号召要推翻国家。

右派民粹主义的胜利在美国让人相当惊讶。若将其脉络化，放入世界历史，这没什么好惊讶。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循环已经到了极限了，经济危机没有转译成更广的政治问题，但是意识形态对于各式集体主义的攻击剥夺了中间和左派解决问题的人性。新自由主义的传递和持续的反集体主义是全球趋势，我不会多探讨这个议题。在美国，这已经恶化很严重了，透过从左到

右的民粹语言之历史迁移和政治而发生。结果，左派不能民粹去挑战右派，更不要说拯救或是推翻资本主义，而右派虽然不是解药，但是却可火力全开挑战左派。

> 左派的自由化

左派不再可以用民粹的声音发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许多的左派意识形态者不想这么做。为了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去看我们这个时代反民粹的历

>>

史。

我追溯了这个消解，并矛盾地回到似乎是理论上最民主的运动：1968（西方的经验）。此运动随着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一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新政的国家主义和官僚制度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合理的，可是反官僚的心态让许多人从国家退位和新自由主义胜利中学到错误的东西。1968是个必要的错误，右派从中复苏，但左派没有。

两个西方 1968 年主要的承袭者是自由左派和无政府主义。他们发展了不指对于组织、意识形态、领导的怀疑，还发展出了对于以人民的名义发言的怀疑。所以他们批评独裁维权主义（极左）或是不负责任（自由左派）。除了南欧和拉美以外（左派民粹回来了，但是没有阶级、意识形态、组织的链接），右派占据了浮现的鸿沟。

1968 的自由至上精神点燃了新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但是在纸上被打败。可是更遭的是左派的分裂，这分裂发生在后现代虚无主义和左派自由主义之间。

什么是左派自由派的计划？虽然有着来自全球的源头和力道，左派自由主义发现了最纯粹的表达方式得以在美国和英国实现。关键词是包容，取代了平等。被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 所启发，英语世界的中心（新劳动党和柯林顿主义）聚焦在纳入更多的人近来。过去 30 年，包容意味着种族、性别、性倾向，但是空间减少了。虽然黑人、拉丁裔、女人、穆斯林等可以取得之前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这些人口也增加了，而被美国轰炸、禁运、剥夺食物的穆斯

林也增加了。

左派自由派对于一般弱勢人民谈的是福利政策，但是民主党领袖不赶针对那些大咖，只好让一般白人开刀，把他们排除在外。然后失落的白人被看成种族主义者，“可悲的人”，不可能说话的对象。

> 左派的自我毁灭和服务于右派

结果，弱勢没有被动员和组织，也无法持续，就像去年总统大选的失踪的黑人选票一样。失落白人是不信任两党，但是觉得自由派更可怕。直到桑德斯的兴起前，左派精英（自由左派和进步派）被困在自由派精英发明的“多元”和“包容”的游戏中。这些让新政更不可能发生。

极左派了，尽管对于自由派左派有着很强的不满意，许多激进知识分子运动者都庆祝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且组织领袖，这导致了左派的“rhizomes”出现，以及进步民主党人的选举主义。从 Seattle 到占领运动，美国左派尽力去削弱而非避免组织化的领导。一旦中样瓦解，右派就更有能力回应。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右派放弃了意识形态和组织化领导。理论上，他们对抗两者，但是只有在塑造意识形态、组织、领导进入范围内的时候。

当左派埋葬了 1968 留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但是却庆祝 1968 的自由和反文化精神），右派组织了反对 1968 的抗议，但是不像革命其他部份宣称要去战斗，右派是有组织也意识形态的，其成功了把主流导向极右，这就是我们长忽略的列宁说的革命理论。

> 美国右派的 21 世纪列宁主义

Steve Bannon—美国另类右派的知识分子一的解雇是一个错误的喘息。事实上，Bannon 的白宫旅程只是长征的一站而已，也就是要把革命民粹的语言、策略、谋略等从左边移到右边。他已经说过：“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想要销毁国家，而那也是我的目标。我要把一切都会摧毁，并摧毁今日的政治精英。”但是这样的列宁主义包括了些什么？在复杂的民主中，列宁主义只能成为长期革命的一个民粹主义而。数十年来社会科学坚持美国没有第三个政党是因为制度而导致。这个“科学事实”已经让自由派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推翻新自由主义）更可以家自我肯定。而美国极右派已经推翻了这个“事实”，这好像他们按照 21 世纪简明版的列宁的《怎么办？》，及开头写说：“若不能创党，那就使其无法运作，或绕过，或是抢过来。”他们同时是做了全部的三种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该书所描述的还是一直持续，“在成为法律上领导之前，确定制度已经跛脚了。”若是茶党没有让共和党精英无法运作，那共和党是有机会抵抗川的。”

美国右派民粹是一种民主条件下的列宁主义。不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必须避免所有的表面的社会和政治，美国右派拥抱社会。修改后的《怎么办？》因此会说：“组织社会的每一个元素，不要低估任何组织和政治的方式，甚至是（特别是）当它似乎属于敌人阵营的时候。”右派学习到不能把教育、科学、文化让左派

“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想要推翻国家，那也是我的目标。我想要彻底摧毁当前的政治精英结构。”

Steve Bannon, 2014

整碗捧去。“挪用敌人的组织领域和意识形态去多展可能性，并拿掉那些无法挪用的。”从 Andrew Breitbart 他自己开始，作为另类右派媒体的创始人是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的。其把健保看得重要，随着川普和 Bannon 的兴起，右派也保证工作和基础建设。

今天，列宁主义右翼无法忽略其他可能的民粹力量，不论有多小都不可忽略。21 世纪的《怎么办？》将会有这样的结语：“若有些敌人是在我们策略可及的范围外，那么要要让那些敌人退后去采取不成熟和不正当的行动。”当另类右派进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和其他传统左派阵营的时候，以及没有基础的极左派攻击自由派的时候，自由派开始防卫自己（以言论自由为名）。自由

派对于言论自由的热情在另类右派在 Charlottesville 开卡车撞入一群反种族主义的示威群众的时候，有点冷却了。但是华盛顿邮报仍然在 2017 年 9 月的时候另类右派回到 Berkeley 时强调极左派的暴力和另类右派的自由。这一石数鸟的结果就是敌人分裂了，困惑，缺乏意志，弱点等都被暴露出来了，名声扫地，而极右派更加集结了。

因为“国家”在今天已经比起 20 世纪的任何定义都来得复杂了，“粉碎”国家只能仰赖比 1917 年更不戏剧化的行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在制度无能为力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将会很快就找到答案。Steve Bannon 在去职之后像他的敌人“宣战”，说要回去使用他擅长的“武器”（电子媒体），而民粹

的革命要在自由主义的土地上（尽管慢慢衰退）展开是个艰难的战役，而且会有反扑的力量。但是好戏才正要开始呢！■

來信寄給 Cihan Tuğal
<ctugal@berkeley.edu>

> 在巴西和南非的民主失序

Gay W. Seidm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美国, ISA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委员(RC44)



南非总统Zuma，卷入金融丑闻。以及也卷入犯罪的Gupta兄弟。

从川普的非预期胜选以来，许多讨论围绕在全求话的挑占和威权民粹主意的威胁，但是这些讨论都集中在富有的全球北方国家。那全球南方的新兴民主情况如何？

过去 25 年来，巴西和南非是一个新时代的骄傲象征：在威权工业化几十年之后，两个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开始建立民主宪政的社会，有着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并且在包容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成长和全球化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两国中人民的运动在 1990 年代结合了公民社会、劳工运动、穷人，变成了后殖民的一个全球象征。两国的政党都在执政后致力于进步的改革，平衡经济成长和民主体权利。

两个国家都是矿产的输出国，并且都在 2000 年代因为价格而获利。受欢迎的政党似乎找到了务实的平衡策略，让外国的投资和地方的人民都开心，维持全球的连结同时制定让穷人受惠的社会政策。

但是今天的南非的非洲民族议会和巴西的工人党都陷入混乱状态，分裂，因为被控诉贪污，失去民心。两个国的贪腐丑闻让政党已经非常难堪，大型私人企业会落政党和政客，为

的是赢得大的营造计划合约，补主，公共合约，造成了大众的愤怒和不满。

贪腐在今天的社会很难说是新的事情，这想当然尔。在两个国家中，威权主义的工业化是精英所推动的历史结果，压迫的政府连结到主要的企业，企业需要政府的帮忙和国家提供的合约。

但是民主也开启了新的透明性，就是民主的制度和媒体已经揭露了那些过去不见天日的案件。在两国中，独立的检调单位也开启新的民主结构，连同对于言论自由的新保护，这些揭露了贪污案件的许多细节。民主国家中的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是可以被司法调查的。

在巴西，工人党给了独立检察官新的权力，让政府调查员让证人可以有较轻的刑期去换取证据。这个改变让检察官可以去调查 Lava Jato 丑闻，使用录音证据去起诉。南非也成立了新的独立检查单位，是透过国会任命，于后种族隔离时代成立。2016 年后其，“公共检察官”是一个宪法赋予的质外，揭出了一连串的贪污案件，这些都是在国家和私人公司之间的丑闻。从那时候开始，大量的电子邮件外流就给了独立的新闻媒体有更多的证据去报导相关

案件，让大众得以知道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暗盘交易。

不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揭露已经造成群情激愤。在两国，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是被反对党所支持的，特别是因为商品化已经让两国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重要的是，关注穷人的政策是透过税收支持的，但这不是富人的税。所以当衰退开始的时候，都市中产阶级愤怒了，在接上或是社群媒体上都是如此。

幻灭也上政治进入混乱状态，曾经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变得颜面无光，并且没有明显的替代方案。巴西的右派媒体支持保守派政治人物，透过“柔性政变”达成，像是前总统 Dilma Rousseff 被弹劾，并不是因为个人贪污，而是她允许会计操弄让社会支持在经济衰退时得以持续。

巴西的保守政治人物很快地就去巩固自己的权力。现任总统 Michel Temer 已经在影像证据中被发现收贿，现金装在皮箱内，但是 Temer 可以透过模糊的法律手段继续执政，议会支持 Temer，拒绝提早大选，这再次确定了巴西统治精英的共谋。

对于巴西的穷人家来说，这个政府的改变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真正变化以及机会的变化。Temer 的未受选举选出的内阁已经取消掉了许多巴西关照穷人的政策，削减福利和服务，取消劳动法律，减少社会支出。

该丑闻已经让巴西曾经令人敬佩的工人党陷入一片混乱，前总统 Lula 也是该党的最受欢迎的人物已经被判处 10 年贪污罪（他最近提起上诉中），该党的基础一包括了巴西的劳工运动一也因此幻灭且溃散。

南非的政治动态指出了巴西失序的的惊人相似性。当国家以商品化为基础的经济衰退时，中产与上层阶级的纳税人会对于乱花的政府资金相当气愤，而现在的民族议会领袖也卷入丑闻，差一点在最近的不信任投票中被拉下，即使其拥有国会多数。

南非总统 Jacob Zuma 的个人贪腐是被纪录下来的：政府上百万的资金用于总统个人的资产，现有案件和电子邮件的揭露也指出了 Zuma 的家庭和亲信都非法取得了政府的合约，包括了 Gupta 集团，这是一间已经被和非法吸取政府资金划上等号的公司。

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并不是唯一的坏行动者。在巴西，就像许多的石油公司一样，建商和农业大企业都被查到贿赂的情形，那通常是用来交换政府的合约。南非的许多白人拥有的企业（以及德国、中国、英国的跨国企业）也被发现类似的情形。

最近的揭露已经让公众的焦点转性那些为全球会计和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专业者：有执照的会计和律师已经让那些腐败的交易成为可接



巴西的主要政党都卷入了贪腐，包括了Temer 总统和受欢迎的Lula 前总统。

受的，有时还帮忙洗白。即使公共关系的公司也是共谋之一，一个英国的大型公关公司 Bell Pottinger 代表 Gupta 集团去协调运作恶意的社会媒体选战，试图把那些 Zuma 的批评者都贴上“白人垄断资本家”的标签。

当然，脉络和历史是重要的，当巴西的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开始把民主政府的改革成果一一削减时，南非的黑人多数民众不会允许政治回到种族隔离了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在巴西，民主政府缔造了真实的进步，改善穷人生活，提供电力，水，资金，福利。

可是若是巴西的工人党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者，然而南非的黑人还是对于民族议会去扩张其社会补助政策感到同情的。两个国家都有着种族隔离的历史，但是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正色仍然阴魂不散，政治忠诚也反应了长期对抗种族隔离的抗争。此外，许多中产阶级的南非黑人仍然被排除在白人主导的私人部门的上层之外，只好从事教师，护士，警察，官僚、或是政治人物，这在民族议会上台后更是如此，并且形成一种效忠的意义。

然而，对于民族议会的忠诚或许正在弱化，特别是在都市地区，那些年轻选民表达了对于高失业率的不满，不适合的社会服务，以及持续的种族化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一位有魅力但是腐败的前民族议会年轻领袖已经吸引了许多年轻投票者到他的新政党：经济自由斗士 (EFF)，但是提供的是相当模糊的承诺。若是 Zuma 仍然在位，民族议会可能会在下次选举丢掉国会多数，而且经济自由斗士可能会取得上风。

接下来呢？两国的反民主浪潮的威胁是相当真实的，并且川普的胜选让这种威胁更加可怕？从 1990 年代早期，巴西和南非的人民本来可以依靠有力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去支持和保护脆弱的民主。但是在川普政府之下，白宫对于相关议题的沉默恶化了这样的全球趋势，而民主可能继续深化下去吗？巴西即使没有军事干政，可是现在的政府还是要把之前的社会公民权利取消，而南非虽然很难看到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但是威权民粹的威胁也很真。

來信寄給 Gay Seidman <gseidman@wisc.edu>

> 仔细检视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ISA未来研究委员会(RC07) 和逻辑与方法研究委员会委员(RC33)



CODESOC的行政干部和PISAC的执行长Juan Piovani于2017年在科技部会面讨论该机构的未来。科技部摄影。

在 阿根廷科学社群很热切地欢迎了新成立的科技部部长Lino Barañao给出他的第一个深度访谈。他接受了报纸Página 12的访问，描述社会科学如何帮助改善国家经济，并描述其支持软件开发、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的计划，被问到有关社会科学时，部长认为应该纳入，但是当他比较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的时候，他坚持只有一个方法的大转变才会让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

不用说，Barañao的说让社会科学家感到相当不是滋味，而社会与人文社会科学院长委员会(CODESOC)也立刻要部长澄清，他们要的是解释，而且更像是一种道歉。同时，他们也希望可以面对面会谈，解释社会科学如何可以贡献给社会。

最重要的是，部长同意出席CODESOC的2009年会议，并且宣布他会大支持和资助社会科学的计划。这是阿根廷的阿根廷了国家当代社会研究机构(PISAC)的滥觞，并且在2012开始于CODESOC下面执行，其包括了50个公共大学的社会科学系所，并且由科技部和高等教育政策院(SPU)所资

助。

设计PISAC有着很大的挑战。很快地我们就发现单一计划不可能满足这个宽广的科学需求，所以，一个研究机构是比较适合的，于是我们把老中青的社会科学家都找来一起激荡想法。

从PISAC的早期时代我们很清楚说计划并没有野心，只是要奠基在阿根廷社会科学的丰富传统上，因为阿根廷社会科学从1983年民主转型之后就开始扩张和巩固，但是我们也承认有各种缺点，像是分裂，区域与制度的不平等，试图要“都会化”研究主题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传播社会学知识的困难(学院内与外)，社会科学发现仍然很难被注意到，特别是那些关于“边陲”地带的研究成果。

这个对于阿根廷社会科学的批判性评估最后带领了我们定义三条研究轴线，包括了超过10的计划。当然，主要的目标是生产一个整全的当代社会的解释，并从跨学科的角度，兼具理论和经验。但是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去检视制度和科学的条件如何影响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并系统性的整合既有的研究。

有趣的是，这样的架构似乎也符合Burawoy的社会学四种类型：批判、专业、政策、公共。PISAC和批判社会学有关是因为其试着检视社会学科学在阿根廷如何被执行，去揭开其理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以及和霸权知识生产体系的关系。PISAC也是一种专业社会学，因为其处理经建的问题，并且使用被接受方法，出版研究成果给学术界的人士。同时PISAC也是希望去超越学术界，许多的研究问题都反应的政策的需要，并且和公共与社会团体一起合作去生产专家知识，影响社会政策。最后，PISAC也介入公共辩论，挑战一般常识性对

于社会的理解，并且批判那些媒体再生产的刻板印象。

因为我们也关心知识生产的条件，所以把目光转向国家的社会科学系统，聚焦在科学与教育制度的地理分布，研究者的学术轨迹，研究议程，出版。[Fernanda Beigel](#) 的本期文章反应了这样的计划是如何分析不同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形式的差异，强调了在服从国际规范的研究者和本地规范的研究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过去研究结果的系统化，我们决定聚焦在 6 个广泛的主题：社会的主题：生活处境、国家政府与公共管理、公民与社会动员和冲突、社会和文化多元、社会消费和实践。每个主题都是被多重制度的团队所负责，并且分析相关的期刊，生产出一种文献回顾。这些报告现在可公开取得，只要去 CLACSO 的虚拟图书馆就可以找到 (www.clacso.org.ar/libreria-latinoamericana)，也可以到 PISAC 的网站 (<http://pisac.mincyt.gob.ar>)。[Alejandro Grimson](#) 的本期文章也呈现了研究成果如何挑战了官方对于阿根廷的同构型社会文化解释。社会科学可以生产更精确的多元文化解释，并让社会弱势的能动性被看见。

最后，为了去让当代阿根廷的社会分析更加先进，我们决定去执行三个全国调查，包括了 339 个乡镇和超过 2000 名居民的民族志。

最后，为了生产出当代阿根廷更完整的解释，我们决定执行三个全国性调查，田野范围包括了 339 的城镇，这些城镇都超过 2000 名居民。其一着重在社会结构和生活处境，其二处理了社会关系，然后第三个则探讨价值、态度、再现。我们选择这个方法的理由有几个。首先，既有研究经费已经首先给小型的研究，遍布各个团体，这让大型研究计划难以发展。再者，一面到地倾向质化研究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其实放弃了量化和结构研究。因为经费不多的质化研究已经研究了非常有限的社会环境，通常是在都市，现有对于阿根廷社会的描述总是忽略了明显的异质性问题。

在这期的《全球对话》中，[Agustín](#)

[Salvia](#) 和 [Berenice Rubio](#) 讨论了第一个调查，强调阿根廷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结构，以及特别社会群体的处境。[Gabriel Kesler](#) 讨论了调查的理性和科学的目标，为的是去研究社会关系，包括的议题有社会资本，社会性，自我认同，社会障碍，冲突社会关系，参与与集体行动，这些都是在全国的层次上进行的。

既然 PISAC 的结果已经开始发表了，阿根廷的社会科学面临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在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之中了，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已经让研究经费删减许多，目前为止，新的政府已经表示支持 PISAC 的计划，而且已经提供资金，不过还是会担心是否 PISAC 可以在科技部中被制度化，以及该部门是否继续支持大规模的社会研究。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见证的后事实论述的兴起，特别是社会媒体，因为他们通常贬低社会科学为意识形态的，所以不应该得到公共资金。类似地，高阶的政府官员也重复地说是支持“应用”的研究和“有用”、“工具性”的知识

然而，PISAC 的初步结果从社会和制度上广泛的光谱中得到很强烈的支持，包括了社会科学家，大学，公共组织，社会运动，记者，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尽管那些反作用力，其结果收到了热情欢迎让我们有理由去对阿根廷的社会研究的未来保持乐观。■

來信寄給 Juan Ignacio Piovani

<juan.piovani@presi.unlp.edu.ar>

> 勾勒阿根廷社会科学的轮廓

Fernanda Beige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uyo, 阿根廷, ISA社会学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RC08)



Buenos Aires的科技部和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Juan Ignacio Piovani摄影。

过去40年来,科学的地理结构已经重新形塑,这是透过出版系统建立了“普遍”的语言和写作格式,并且透过主流圈子建立了少数学科的优越性和核心,忽略边陲的社群,把一些期刊排除在科学信息机构的名单之外(ISI,现在是科睿唯安科学分析网站公司)

然而,有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主流之外的学术网络,包括了开放使用运动,区域出版社群,像是拉美科学出版。从1960年代开始,拉美社会科学历经了名声建立的“区域化”,透过区域中心的建立,以及科学政策的“国家化”。

在跨国社群之外,地方的学术社群也包括了许多排名之外的期刊,这些期刊的流通有限,但是反应了非跨国学术空间的持

续性。这些边陲的科学社群的动态为何。我认为这些不同的学术场域开启了极化的空间,导致了学术精英的“两面性”,一面是往外看,一面往内看。

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和评量之间的紧密连结产生了一种多元的正当化原则,以及不同的肯认场域(都是有效的,但是伴随不同的奖励),并且跨越了国家边界。

学术社群的破碎化以及其对边陲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不是仅仅是英文霸权的结果而已,这些场域也被相互竞争的文化和结构不对称而导致,这有三重的阶层化原则,以出版语言,机构,学科为基础,形塑了学术的不平等。

阿根廷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可以用来分析出版和流通的形式。最近几年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资金，越来越稳定的各种博士学位，还有可见的“民族国家”的对于阿根廷学术架构和研究的强调，全职的研究者在过去10年成长三倍，从2003年的3,694增加到了2015年的9,236人，然而这段期间在阿根廷的主流出版形式的学术和地方性的学术差异也增加了。

出版排名指标定义了不同的奖励形式。在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CONICET 中，国际期刊的出版或是 ISI 以及 Scopus 的排名期刊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 CONICET 的社会人文科学和农业科学系所是重视地方期刊的和被收录在 SciELO 或是 Latindex 里面刊。评量的文化则是对质量和原创性的强调转向了评比排名、影响系数，或是 h 指数，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可以辩论的。

在国家、地方、非排名的期刊出版被认为是那些非都会地区大学的研究人员的途径。阿根廷的教育系统有着大学自主和政治化的传统，地方肯认场域仍然很动态，数以百记的地方期刊仍然用纸本，而地方学者用不同于国际的标准去发表。这些文章的质量不好吗？因为这尚未被研究，我们无法下定论，但是地方发表在地方很常见，特别是社会科学。

随着这些多重（甚至相反）的评量架构，阿根廷社会科学家若要追求地区或是国际的路径，那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在 CONICET，一个在国立大学），这也关联到50所国立大学的升迁管道的差异。

生涯最佳的出版前五项

CONICET 的社会科学家之中，若是国际标准是主流，那期出版的特征为何？我们检视了4,842人的样本（7,906为总数），其申请升等或是被问到列出生涯最好出版前五项。这包括了超过半数的 CONICET 研究者，并且在学科、年龄、阶层有所平衡，涵盖了助教授、项目教授、独立、主要、杰出教授等，该机构接受每年一次的申请，并且是自愿性的。

重要的是，申请者选择了5个生涯最好的出版，这是以他们自己认为最可以让评鉴小组印象深刻的。因此，其选择提供了我们可以探讨评鉴表准的机会。许多的案例中，特别是人文社会，这些选择并不代表其履历上的其他出版。

处版的数据库包括了23,852个项目，包括标题、类型（书、章节、文章、会议论文、技术报告），还有语言最佳出版前五

项的语言很同质，应于占了4.2/5，其中男性是4.13而女性是3.91。年长（65-85岁）的平均值稍微低了点，但是差别很小，显示了英文写作可回到好几十年前，关于语言，以区域而分的数据也显示了出版的英文多数文章是在“硬”科学领域（4.77），而社会人文研究者则是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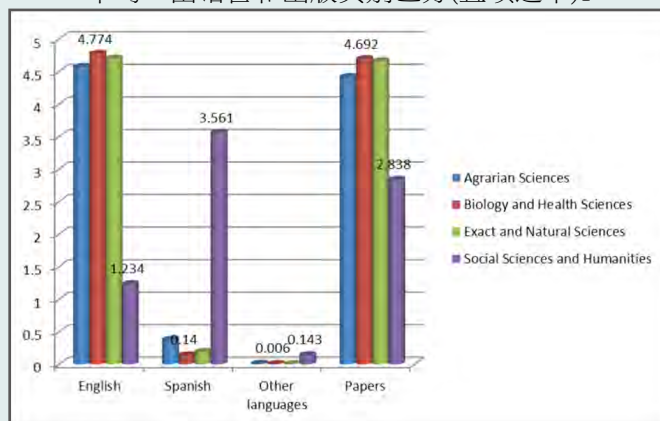
这个出版类型反应了更多的变异，因为书籍和书籍章节在年长研究者中更普遍，在年轻学者中（31-44岁），5人有4.4人的生涯最好出版是文章，代表“论文”变成了越来越主流。而文章的平均数对于社会人文研究者而言是2.8/5。不幸地，尚未有对于书籍主版的地方或全国研究。

有趣的是，多数的在国立大学或是 CONICET 附属中心的941名人文社会学者是和其他国立大学学合作的（像是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UBA)）。以教育背景而言，33.7%在UBA取得博士，稍微高过平均值，而43.5%也从UBA取得硕士，超出平均值很多。性别方面，56%的人文社会学者是女性，而平均来说1.14/5的生涯最好出版是英文。对男性而言，1.35/5的出版是英文。若比较“女性”的学科，语言的变异很大，所以性别不是决定因素。因此，例如文学的出版多数是西班牙文，而心理学多数的英文。

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涯最好出版的流动中学到什么？可以在图2中看到，83%出版在主流场域中传播，而其他17%则是在主流场域之外，人文社会学者占76%，或是国际会议发表的论文占24%。

CONICET 的社会科学家符合了一种以排名为基础的评鉴架构的图像。虽然这个领域呈现了在主流场域较少的出版数量，但是区域的排名优先选择是很明显的。Sci

生涯最佳的出版前五项，由2015年的领域区(n=23,852)平均，由语言和出版类别区分(五项之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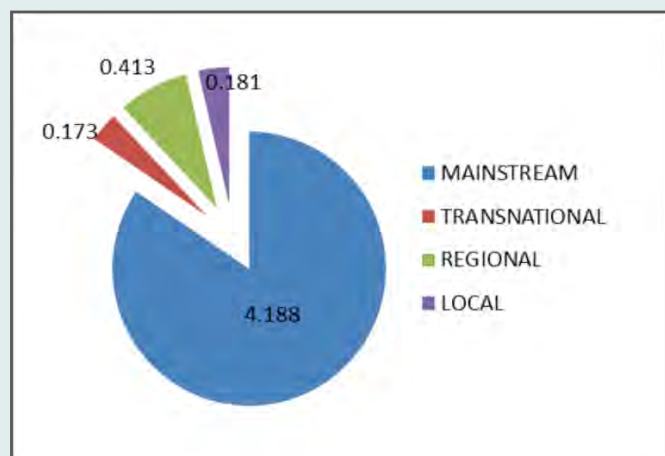
ELO、Latindex、跨国的 DOAJ 和 Dialnet 是许多人文社会学者的选择。7% 的阿根廷出版是列入排名的，而多数是社会人文期刊。主流的趋势是要发表到 Latindex 的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文期刊。

在他们的履历里面，多数社会人文学者有更多的地区出版，但是名声的分布在阿根廷的学术界是复杂的过程，伴随着现有和多重的正当化原则，以及肯认的场域。

來信寄給 Fernanda Beigel
<mfbeigel@mendoza-conicet.gob.ar>

註 1：這兩章圖可以在以下的文章中找到：Beigel, F. (2010) 《全球對話》〈Social Sciences in Chile (1957-1973): A laboratory for an autonomous process of academia-building〉, 收錄於 Alatas 與 Sinha-Kerkhoff 編輯的《Academic Dependen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tructural Reality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New Delhi: Manohar》, 頁 183-212, 以及 Beigel, F. (2016) 〈Peripheral Scientists, between Ariel and Caliban.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Circuits of Recognition in Argentina. The ‘career-best pub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ers at CONICET〉, 於 Dados 59(4): 215-255。

平均生涯最佳的出版前五項，由2015年的社群区分(n=7,071)



> 阿根廷的社会和文化多元性

Alejandro Grims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tin, 阿根廷



在Buenos Aires的同志大游行中玻利维亚移民庆祝多元并且抗议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
Federico Caruso摄影。

每个国家都是在社会和文化上异质的，并且是多过于自身的想象的，不过阿根廷或许是个极端的案例。多数阿根廷人认为巴西有更多的原住民，可事实上，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巴西人包括了850,000自我认同为原住民的人，阿根廷则有950,000，在巴西的比例是0.4%，而阿根廷是2.4%。

在阿根廷，国家以经建构了一个南美欧洲社会的自我图像，好像整个国家都是Buenos Aires。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个图像已经陷入危机。原住民运动，新普世主义，国家的衰弱，逐渐对异质性的接受，这些都伴随着那些挑战国家的典型想象，像是欧洲、白人、地理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研究者已经避免把多元性塞到全球的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模型之中。

> 传统的解释：欧洲主义和熔炉

把阿根廷描述成熔炉的论述从起源于国家的民族主义计划的。针对这点，阿根廷“和大船脱勾”（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这是一个囿限于并且自然化了普遍的欧中白人特质。这也是被明显的原住民和非裔人口的缺席而支持的，因为该国的主导群体是中间派和“porteño”（Buenos Aires居民）。

像是在巴西，阿根廷的预设的熔炉是没有纳入原住民和非裔阿根廷人的，但是“种族”是从欧洲民族主义而来的。自从19世纪以来，阿根廷试图要开启一个“文明”的国家，倡导

移民和经济成长，并发展公共教育。这个计划有赖于去预设欧洲移民会支持了本土人口的文化惯习，而这却是一个发展的障碍。

政府的压力去建构一个族群的国家、同质的文化，社会包容，这意味着每个变化或是特殊性都是负面的，或是直接视而不见。只要同构型计划成功，皆急救变成了政治的禁止话题，被制度强烈反对。

因此阿根廷发展两个完全不同的“平等”的意义，并且是在这个协议上为基础的。去避免族群差异的不可见性，避免文化同构型，然后这成为取得公民身份的条件。

透过这个协议，每一位阿根廷人可以加入精英或是都市中产阶级，然后“漂白”。每个人可以最终逃过免于受歧视的命运。可是在排除工人群众、大众，并视之为穷人，“negros”，野人，或是“内部移民”，特别是当他们参加政治的时候把他们排除在外。然后相反地是文明，阿根廷的，白的，欧洲的，受过教育的。

大约 56% 的人口有着原住民的血统，虽然这不意味着他们有原住民的认同。阿根廷长期拒绝异族通婚，但是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包括原住民，地缘，宗教，语言等，而且阿根廷的政治历史也根源于标准化和排除。

阿根廷的文明化模式是二元的，而且二分的社会自我形象也仍然很强，以至于继续成为国家的“心灵的习惯”，包括了政治。白或黑，文明或野蛮，首都或地方省，裴隆（支持裴隆党的人）或是反裴隆。

> 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

阿根廷是一个“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国家，按照古老的迷思：“在阿根廷没有种族主义，因为没有『negros』的存在”。虽然很少人是属于非洲裔，“negro”或是“negro de alma”（黑灵魂）通常被用来指向穷人，住在贫民窟的人，工会工人，街头抗议者，Boca Juniors 足球队的粉丝，或是裴隆主义党人。

然而，没有一个政党透过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而得到多数选票。阿根廷并不都是种族主义的，也不是所有的种族主义态度都是一样的。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针对深色皮肤的移民（“el interior”），针对非裔移民（特别是从塞内加尔来的），以及和针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都是不一样的。此外，种族主义通常和阶级交错，像是“negro”被当作“穷”的同义词。

社会研究显示即使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在白人为主的高级生活质量地区是普遍的，这些意识形态也被整合到了大众阶级的语言之中。更糟的是，“negro”一词也在每天的生活中可听见，用来表示亲密性和情感，特别是

在朋友、小孩、父母、夫妻之间。“Che, negro”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主要用于非正式的亲密朋友谈话中。

> 地区，语言，宗教的异质性

阿根廷社会深深地在信仰、实践、仪式、认同上面是异质的。然而，若认为有一个主导的阿根廷文化，那不仅是忽略了不同地区和省份的差别，也轻视了社会文化的生产，美学或是科学的都是，因为这都质疑了同构型的存在。

阿根廷的自我认同是以很强烈的以西班牙语和天主教为基础的。然而现实上却更复杂。原主民的语言像是 Kichwa 和 Guaraní 在一些省份是通的，中文和韩文则透过移民而在 1980 年得以被看见，然后由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增加，也上西班牙语成为通用语言，

但是会有不同的用字、俗语、语调等，宗教多元也是很复杂的。虽然许多原主民经历改宗到基督宗教，一些原主民信仰继续形塑了认同，而许多阿根廷人今天也信仰犹太教，各种新教，非洲巴西宗教，伊斯兰，佛教，唯灵论等。

> 阿根廷的社会文化多元性与未来

除非阿根廷开始给予国家的多元性更多的关注，不然像是许多国家都会经历的阶段，并且在阿根廷似乎是循环性的，那就是歧视移民。这种歧视把差异看成道德上的、名声、权利上的差序。而已十年来被预设成只有 Buenos Aires 的人有正确的发音，而其他人被认为则是落后的。

今天，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阿根廷欢迎“新移民”来工作，但是拒绝与其在日常生活中互动。这些“新移民”其实并不“新”，针对这些人的歧视通常是那些邻近国家来的人，像是玻利维亚，巴拉圭等，其数量从 1869 年来就很稳定，根据人口调查，数量从来没有少于 2%，但也从没超过 3.1%，而阿根廷的移民小孩也通常被认为是玻利维亚人，这是一个常见的称呼，指的是从西北来的人或甚至是穷人。

这个现象自从 1990 年代快速地扩张，失业率上升到 15% 的时候，以及然后的 32%。这个有关移民的概念是认为移民会偷走工作，并且在许多社会相当普遍。但是，阿根廷是非典型的，2002 年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减少了排外主义，而且事实上 2004 年有法律延伸了移民的权利，研究指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持续中，产生了社会的种族主义，但是没有政治上的排外主义。

然而，每次衰退的时候失业率伤生，歧视性的言论就会在公共领域中就挥发影响力，只要多元性会让阿根廷的重统自我欧洲人认同

产生动摇，但是没法将其取代成更民主、包容、跨文化的观点，那种族和阶级的不正义将会持续下去。■

來信寄給 Alejandro Grimson
<alegrimson@gmail.com>

> 当代阿根廷的社会不平等

Agustín Salvia和Berenice Rubio,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Buenos Aires的贫穷和富裕的居住区。Juan Ignacio Piovani摄影。

多数的拉美社会被认为低度发展和非常不平等。在 20 世纪中，阿根廷社会似乎呈现了相反的图像：高都市化、高度就业、全民健保、教育、工业化、中产阶级的兴起，不平等不严重，且有高度的社会流动。

但是社会变化了很多，进步的成果也退步了不少，特别是在 20 世纪尾声，新自由

>>

主义的结构变化导致阿根廷社会无法避免失业的冲击,经济自由化,贸易开放,金融化的弹性导致了不稳定,失业,贫穷,社会排除,使公共健康恶化,教育降低,社会保护消失。

这些过程产生了一个高度不平等、冲突、不稳定的社会,这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恶性循环,于2001-2002年开始,是阿根廷当代历史的最低点。

相反地,21世纪的前10年因为由于国际脉络的影响证明了经济、职业、社会、政治、制度的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期间并不持续很久,经济再度放缓,社会结构的分裂也愈来愈明显,2015年阿根廷社会有了许多的贫穷、边缘化、排除的群体,大约30%的人口是贫穷人口,6%处于极端贫穷之中,无法取得食物。这也因为都市边缘化效应而恶化,35%的家庭没有排水道,20%没有水,15%住家很危险。

为了响应这样贫穷的处境,不同的论述在拒绝、沙文主义、牺牲者的论述间摇摆。我们太长看到好像阿根廷社会是同质、一致、整合、公平的社会的论述,这样的刻板印象是被国家的民族建构过程中所建构,并且被中产阶级所强化。但是许多其他的人相信自己是活在最贫穷的国家,有着最糟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这些矛盾的图像一有着光荣的过去和现在一在媒体和政治论述中充斥着,这个脉络下,阿根廷社会结构调查(ENES),这是一个国家研究机构PISAC主要计划之一,为了探讨两个相关的过程,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以及边缘团体的生活处境。阿根廷缺少了可信赖的社会统计和整全的结构分析,ENES已经有了很大的贡献,收集资料和研究想是阶层化、社会流动、居住、生活处境、再生产社会策略等,跨越不同的地区和群体。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建构一个经验研究为主的社会解释,挑战刻板印象和迷思。

事实上,数据显示了阿根廷的现有社会结构是异质的,不平等的,分裂的,顶端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组成了传统家庭和新布尔乔亚,代表了少于3%的人口,再来是上层中产阶级,包括了企业经理、专业人士、生意人、农业生产者、中小企业,还有技术劳工。这些人和精英涵盖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整合到西方文化之中,有好的教育、生活质量、消费,就像南欧的中产阶级一样。许多这些人都在Buenos Aires

市中心和郊区,以及中Pampas的主要城市,或是地方首都的高级区域。

再来,另外33%的人口组成了中产或是中低阶级,这是一个由中产和中低阶级组成的群体,包括小企业雇主、工人等,半技术劳工,退休人员,独立专业者等。虽然他们的收入在贫穷线之上,且多少工作稳定,这个群体多半没有社会流动性,而且这些人面对经济衰退和技术变迁的时候最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公共服务质量下降,中低阶级的人通常使用私人交通工具、健保、教育,为的是改善生活,但是通常没有用。

最后,在金字塔的底端,33%的阿根廷人组成这个群体,包括了贫穷的前中产阶级,新贫,被排除的人。总体而言,这个阶层包括了自雇工人,非正式工人,农人,小农等,来自边陲地带,他们的收入总是从不稳定和临时的工作而来,或是社会补助而来,这些人是主义的低质量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公共教育、健保的使用者,他们活在贫脊的乡下,或是在集体的公共住宅,位于阿根廷的东北和西北。

在最后一个群体之中,许多家庭经历了严重的剥夺,基础建设的缺乏,以及环境风险。此外,失业率(9%)和非正式工作(30%)都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包括了45%的尚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也包括了15%的童工和8%的儿童,他们受到了严重的食物风险。还有,这些家庭的女性也受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排除,通常因为家庭因素或是非正式劳动参与而辍学。

跨领域的研究团队政策分析由ENES收集的资料,整合出一个阿根廷社会最完整的解释。当这些分析完成后,他们将会呈现社会的不平等和异质性,彰显了阿根廷贫穷的广泛不同经验图像。研究成果也挑战了既有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论述,那是在阿国和地区相当普遍的论述,歧视图把社会成就描述成是个体的努力成果,并把贫穷归咎给个人的失败所导致。透析社会生活处境和不平衡的机会,我们的数据显示了不平等形式如何交织,集中在某些地区和群体。

使用来自人口超过2,000人的339城镇,超过8,000个家庭和27,000名个体的样本数据,ENES的发现显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包括阶级、性别、年龄、地区、环境、教育取得等等,如何交错。数据也提供了一个社会的复杂图像,可以让地区

内和地区间的比较普片化，提供一个有别于以往仅仅聚焦在都市地区的研究一个不同的图像。

这类的研究让我们可以对于阿根廷贫穷、边缘化、社会不平等有更好的理解。透过呈现我们的研究发现不仅仅是在学术内，也包括民意的层次，我们希望可以产生民主的辩论，去辩论如何往前进。我们希望科学资孕将会深化和加入这个辩论，挑战化约和简单的社会论述，并且贡献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基础，去面对阿根廷的社会议题。■

來信寄給 <agsalvia@retina.ar>
和 Berenice Rubio <beer.rubio@gmail.com>

> 研究阿根廷的社会资本

Gabriel Kessl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ISA未来研究委员会(RC07), 社会阶层研究委员会(RC28)和社会心理研究委员会(RC42)委员



在2016年怀念真相与正义庆祝游行上的年轻舞者。这是军事政变的40周年。上千阿根廷民众参加了，支持人权。Juanjo Domínguez摄影。

阿根廷的微观社会关系为何呢？这些关系如何变化，而又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而阿根廷的过去如何改变了现在的社会关系？PISA（阿根廷国立当代社会研究机构）的全国社会关系调查（ENRS）将会研究社会问题，并聚焦在社会资本，社会性，自我认同，社会障碍，紧张，参与，集体行动。考虑到其地理范围和主题，这个调查是首例，所以会提供新的信息，并且作为其它拉美国家社会调查的架构。

之前阿根廷的研究从传统的观点去看网络和社会资本，分析社会支持网络在最不利的领域，像是在2001年危机之后。我们设计ENRS的时候，利用了国际研究的架构，希望可以让比较研究得以进行，但是我们也调整去反映更多的地方特征，按照最近的先导调查（质化和量化），我们将会于2017进行田野调查，这篇文章我将呈现主要的想法和假设，这些都是关于这项微观社会关系的调查设计。

人们的个人关系网络如何因为社会群体而有不同？我们可以找到任何规律性吗？如果可

以，那会是什么样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使用了“姓名”产生器，让我们可以重建受访者的社会网络。关键在于去判定过去比较紧密连结的阿根廷社会留下了什么线索，又和最近的新自由主义阶段有什么不同。（如Salvia和Rubio在本期描述的一样）。特别是我们想知道是否老一辈的人的网络比起年轻一辈的更异质？而谁的社会化得以再破碎的社会下进行？此外，在先进国家和拉美国家，国际研究的证据显示我们往社会阶层下去，个人网络包括了更多的亲属和紧密的关系，我们的假设是其他的区辨原则像是政治倾向，文化，消费的会和阶级划分有关，性别关系的改便也很重要，我其他去找到更多元的年轻女性网络，因为她们越来越多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我们也会看是否年轻人的需你世界的高度参与影响了其网络结构，超出线上网络。这个调查也会研究现代和传统地区的差别。

我们对于社会资本了解多少？它们如何被测量？这是本调查第二个模块。我们认真看待社会资本的概念，将其定义成关系和资源。的

>>

确，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具有相同价值的，因为其价值是其可以动员的资源数量和质量所决定。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跨国组织好像忘记了这点。许多政策制定者预设穷人可以透过其社会关系（并定义成社会资本）去克服困难处境，而不用去考虑其可获得的资源，这挑战了所谓资本的定义。

在拉美，对此议题有两个相反的看法。一方面，古典的看法是道德经济，连结到先驱性的智利人类学家 Larissa Lomnitz 于 1970 年代的研究，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人弱没有办法透过市场和国家获取需求，那就设法建立网络生存。因此，地处边缘的人 would 看到比较强的网络。另外一方面，以 Robert Castel 的去附属的概念，从劳动市场被排除是和社会退化有关的，这也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为如此。劳动排除将会侵蚀微观的社会关系，而非强化知。我们的假设是两个解释对于最不利的群体而言都可能是对的，所以挑战将是解释未什么我们找到一些去付属性的例子，也找到了强化付属性的利子。

我们也会研究网络和资源之间的关系：什么串播了，在什么人之间传播，以及透过什么方式？串播交换包括了货品，劳动合约，照顾，建议，支持等，我们希望去了解资源交换如何因为不同社会群体而不同。此外，我们也对于金钱的流通很有兴趣，像是贷款、礼物、第三方付款等。希望可以检视收与受，然后了解流通和互惠。再一次我们把社会资本看得很重要，就像是寻找“黄金接触”一样，也就是任何处于有利位置的关系，像是权力、金钱，以及或是社会接触，谁可能有过特殊的流通，在什么关键时间点。

那不同型式的社会性呢？这是我们第四个模块的问题，聚焦在友谊、家庭、更表达性的社会接触，像是面对面或是虚拟的，这里资本或是交换都不再重要。我们也想看关系的形式以及接触的频率，特别是人们和亲戚之间的关系。

关于虚拟世界，我们期待发现其不但不会降低社会性，还会增加彼此，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虚拟关系。但是阿根廷是个有着密集都市生活的国家，我们也关注社会性被实践的地点，以及空间。此外，我们也研究人们和其他国家的连结，假设这会是个对于移民和上层阶级重要的连带。友谊对阿根廷社会也很重要，所以想研究其从哪来和从什么空间来，并把不同社会化的场域考虑进去。

自我认同和社会障碍的模块则是研究自我认同和网络建构的形式。这个意义上，我们希

望去判定什么硬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是社会障碍，以及当成立了关系网络的时候是如何。还有，因为冲突是微观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调查也会去看麻烦关系和冲突的类型，包括所有的暴力和侵害。

最后，我们也检视不同的组织，花费的时间，以及进行的活动，这目的是研究人们的参与。普遍来讲，之前的研究认为组织参与的层级很低，但是我们也有兴趣去问是否社会媒体改变这个，也去问特殊和断裂的参与形式，因为这些很可能被传统调查所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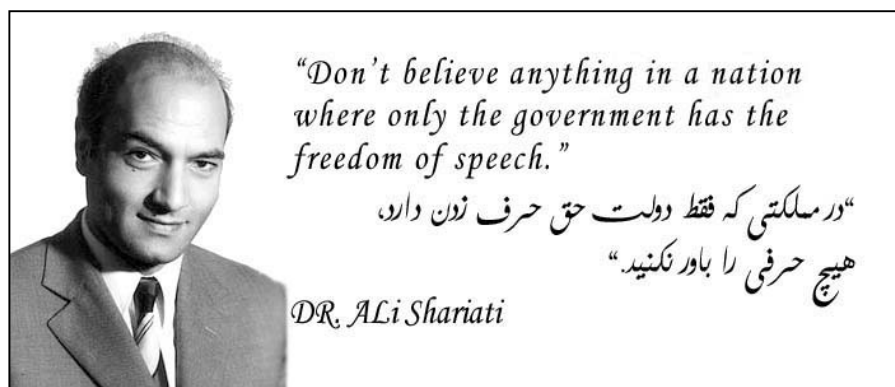
这些只是 ENRS 的某些方面而已，和 PISAC 一起，我们希望发展出一个对于阿根廷社会的重要理解，这是第一次有这种规模的尝试。这也让我们不仅仅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社会，也更和社会学中的国际讨论有所对话。一样中要得是我们希望调查将会对于将来的公共辩论以及社会科学对于公共政策的发展的贡献，奠定扎实的基础。■

來信寄給 Gabriel Kessler
<gabriel_kessler@yahoo.com.ar>

> Ali Shariati

被遗忘的伊斯兰社会学家

Suheel Rasool Mir, University of Kashmir at Srinagar, 印度



Ali Shariati.

Ali Shariati (1933 - 1977) 是被广泛认为是伊朗 1979 年革命的 Voltaire。他在一个宗教家庭出生，1963 年于获得 Sorbonne 的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得到博士学位，在 1977 年过世。在 Paris 他是很积极地阅读 Karl Marx, Jean-Paul Sartre, Georges Gurvitch, Frantz Fanon 和 Louis Massignon 的，并且在前革命伊朗受到广泛尊敬，其被认为是“找麻烦的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必须少说话。其特殊之处在于其把宗教整合到其他知识传统。

Ali Shariati 博士是试图去寻找在现代、西方主导的世界中穆斯林所面对问题之答案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之一。其认为文化的重新导向去肯认个体能动性和自主性是可以帮助穆斯林社会去克服其停滞和发展落后的结构原因的。Shariati 的反殖民论述中强调了宗教在解放社会中的角色，呼应了 Frantz Fanon 对于“新人类”的诉求，其提出了“新思考”

的想法，是一种“新人性”，追求更人性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不会去把第三世界变成欧洲，美国，苏联。

Ali Shariati 作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思想家，其主要在阐释伊朗于 1960 和 1970 年代的激进社会政治变迁的宗教论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此原因，许多学者把 Shariati 看成是政治伊斯兰的倡议者。而区别 Ali Shariati 和乌理玛 (ulama) 的关键在于前者把宗教放在社会学得脉络下来看代宗教的角色和功能，这与涂尔干和韦伯是一致的。而其很大一部分的作品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像是历史决定论、阶级斗争，去重新诠释伊斯兰。其神学马克思主抑或是神学画得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创意的知识贡献。对他来说，重新诠释过后的伊斯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地方被需求。

以 Shariati 的观点来说，宗教作为运动是一个现代思想 / 意识形态学派，而宗教作为制度则是一个教条的集合。在

《Religion against Religion》一书中，Shariati 认为神职人员对于伊斯兰经典诠释的掌控是为了建立一种神职的专制主义。以他的话来说，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也最压迫的一种专制，是“所有专制独裁的源头”。Shariati 强调：“宗教有两个方面，彼此敌对。例如，没有人像我一样恨宗教，但是也没有人像我一样对宗教充满了希望。” Shariati 成功地生产了一种激进的常民宗教，将其和传统神职制度分开，并和世俗的社会革命、科技创新、文化自我肯认结合。

Shariati 相信只要启蒙思考者、知识分子了解其信仰的真理，那么社会变迁将会非常成功。知识分子阶级是社会的良心，有责任开启社会的复兴和改革。所以年轻时候的 Shariati 偏爱“奉献 / 指引的民主”。在《Community and Leadership》中它倡议“奉献 / 指引的民主”的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唤起公共意识，指引民意，特别是在革命后转型期间。他作为

一位社会运动者也总是关心社会正义和试着开创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现有的民主是很有线的，而 Shariati 最大化的观点诉求的是激进的民主。

Shariati 的强烈平等主义思想和对于阶级不平等的批判让他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然而，对他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还是生活模式。他批判国家社会主义对于个人、政党、国家的集体崇拜，提出一种“人道社会主义”的想。按照 Shariati 的话来说，国家的正当性从公共理性和自由集体意志而来，对他来说，自由和社会正义必须互补于现代的灵

性。他的字由、平等、灵性的三元结构是一个对于“另类现代性”的创意贡献。

Shariati 的遗产和当代的追随者已经贡献给了一种对于错误二元对立的解构的努力，像是伊斯兰 / 西方，东方 / 西方。他倡议一个超越两极的第三条路，其思想和其他当代的改革主义思想家，像是 Abdolkarim Soroush 和 Abdullahi Ahmed An-Na'im 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有着相同之处。Shariati 对于社会学得贡献在于批判指出非西方社会的西方文明化宰制和预设。其许多的著作和当代世界息息相关，而且非常有用，历久弥

新。■

來信寄給 Suheel Rasool Mir
<mirsuhailscholar@gmail.com>

> 《全球对话》 中文编辑



何經懋

何经懋于2010年担任台湾大学社会系特聘教授陈东升的研究助理时有幸加入了《全球对话》的编辑团队。一开始头几年陈东升教授指导翻译和编辑的工作（偶尔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张茂桂教授也会给予建议和指导）。从第一卷第一期开始，何经懋就很享受这份工作所带来的乐趣，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人事物。他现在是美国 Cornell University 的社会系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前于台湾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和资讯工程的硕士学位。其研究知识分子象征斗争的硕士论文获得台湾社会学会颁发最佳硕士论文奖。他的博士论文从比较和历史的角度的去研究统计学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此外，其研究领域还包括了政治社会学，科学和技术研究，跨国社会学，量化方法论，理论。■

來信寄給何經懋
<hojingmao@gmail.com>